



MG
D692.09
342



3 1798 6870 2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目錄

政治與羣衆.....

三月一日在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演說辭.....

「平和」「奮鬥」「救中國」.....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國民革命」之意義.....

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掉廖仲愷同志易諸同志.....

革命的分予應有之決心.....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目錄

一九

三三

二六

三三

四一

五三

五七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目錄

二

-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六三
- 十月二日在陸軍軍官學校就職黨代表演說詞……………六九
- 國民政府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八三
-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九一
- 歡迎港僑之演說詞……………一〇三
-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演說詞……………一二八
-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歡迎詞……………一二三
- 什麼是反革命……………一三七

政治與羣衆

這幾日內，「南洋」同文「文治」幾間大學，邀我去演講。我的題目是「政治與羣衆」。

內容分爲幾個問題：第一問，「今日衆羣最缺乏而又最需要的是什麼？」答的是「好政治」；第二問，「如何能得好政治？」答的是「祇有革命」；第三問，「革命如何能得成功？」答的是「祇有得羣衆的協力」；第四問，「如何能得羣衆的協力？」答的是「祇有結合一個以羣衆利益爲基礎而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這幾日，就這幾個問題，逐一討論，有各異的所在，因爲特別注意之點，有時不同，有相同的所在，因爲講者雖然重複，聽者却不是重複，如今將他湊合起來，做成這一篇演說辭。

最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全國人民，對於國事，都抱着精神上的無窮痛苦。在全國人民裏頭，越是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那些痛苦越是加甚。難道那些痛苦，便永遠不能解除的麼？便永遠不想解除的麼？譬如父母有病，爲人子的，越是愛心，越是着急的延醫診治，對於國事，



也是如此。我們不但抱着苦痛，還要着急的想出能解除苦痛的方法。

一個人若沒有缺乏的時候，往往不知道需要，不知道需要的時候，往往不知道承受。如今既已感着苦痛了，便已是知道缺乏和需要了，便已是知道承受了。然而對於簡單的現象，或是如此，若是複雜些的現象，他的知道，便不能如此貫徹。例如一個人，餓而思食，可以說是因缺乏而知道需要，及其得食，可以說是因需要而知道承受，然而那些食料裏頭，是否適宜於衛生，是否適宜於這個人的體質？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補益的質料，這裏頭剛剛沒有，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避忌的質料，這裏頭剛剛存在，如此則食了下去，往往非徒無益，而且致病。他所承受的，未必是他所需要，他所需要的，未必是他所缺乏；換一句話說，他所缺乏的，他不知道需要，他所需要的，他不知道承受，吃飯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尚且不容易知道，蘇格拉底每舉一事問人：「你知道了沒有？」那人答道：「知道。」及至蘇格拉底逐一的問下去，那人畢竟是不知道。如今我舉吃飯這一件事來做個例，已是如此。國事比較吃飯，複雜何止幾倍，所以我們對於國事要想救治，不能不先問：「他所需要的，是什麼？」他所缺乏的，是什麼？」

好逸而惡勞，是人類的天性，好生而惡死，尤其是人類的天性，如稟告訴他道：「這件事，你是必須去做的。」他根據了好逸惡勞的天性，搖搖頭，不肯去做；如果告訴他道：「這件事，你如樂於不去做，你便要死在眼前了。」他根據了好生惡死的天性，沒了法，也只得搖搖頭，嘆口氣，終與去做了。從前進化學者說：「進化是人生幸福所必須的。」有許多人，搖搖頭，不答應，他說：「有飛機，有汽車，有汽船，交通便利，是人生的幸福。」他卻說：「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纔是人生的幸福。」你拿他怎麼樣呢？如今進化學者卻說：「進化是人生所必須的。」這句話，無異告訴他道：「人家已經用着飛機，用着汽車，用着汽船，一直闖進了你家裏來了；你若還是用獨木輪的手車，用大眼鷄的帆船，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命過？人家已經用着機關砲，用着機關槍，來攻殺你了；你若還是用馬步弓箭，用大鳥槍，來抵禦他，你如何逃得命過？還怕你不隨着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洲的棕色人，一齊的等着滅種嗎？」這樣一說，進化雖然是極討厭的，極可惡的，使我們不能舒着懶筋，吃太平無事的飯，睡太平無事的覺，而性命要緊，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向着進化那條路走，口裏頭雖然喃喃的怨恨不絕，脚步卻已是不能

不挪動了。除非我們充什麼佛和菩薩，念念有詞的道：「涅槃，滅度，」懶得極了，索性連生也不要，那麼，我們只好離了這有生物的活星球，搬到無生物的死星球裏去住。如其不然，那就不能偷懶，一定的要向着進化那條路走。物質方面是如此，精神方面也是如此，精神方面的進化和物質方面的進化，原沒有兩樣的形式。人家已經解決了貴族和平民之爭，君主和人民之爭，如今要進而解決富人和貧民之爭了，我們如果還是在這里，做什麼帝制的夢，復辟的夢，以至於什麼托辣斯的夢，那麼，我們的前途，只有兩步。第一步是亡國，第二步是滅種，我們如果說不怕，那便沒奈何，我們如果還有三分的不忍人之心，我們惟有硬着頭皮，大踏步的向着國內和世界。上那些對於貴族的平民，對於君主的人民，對於富人的貧民，大聲吶喊道：「我來參加戰綫。」除了這樣，再也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以上這兩樣，是明明白白的，無可疑的，我們今日，最缺乏的是什麼？和最需要的是什麼？似乎也可以知道了。

然而今日羣衆的情形，似乎還不大知道。辛亥革命的時候有許多人歡歡喜喜的說道：「唉！如今好了，從此大家可以食便宜的米了！」似乎羣衆的缺乏和需要，是「食便宜的米。」這

顯然是不錯的。可惜的是剛纔下種，便想吃飯，把中間一大段耕耘收穫等等辛苦的工作，全忘卻了。不到一年，大家便覺得革命太費力了。有一位老先生，撇着鬍子的說道：「吾儕小民，有幾許的命，來禁得你二革三革四革五革六革七革哉！」這幾年來，大家不但是革命二字不用提，索性連政治二字也不用提了。提起革命，說是「搗亂」，而且唉聲歎氣的說：「今日的人心，已經厭亂到極點了。」提起政治，說是「齷齪」，似乎這只是那些軍閥和政客專制的名詞，和一般人沒有關係的。那麼，我要問問他，今日羣衆所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什麼？到底是什麼？

教育麼？實業麼？這誠然是羣衆所缺乏和需要的，教育實業如果進步，國內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自然也便進步了。却不知道教育實業能有進步，正和方纔所說「食便宜的米」是一樣的話。因爲這已是結果，不是原因啊！沒有政治進步而教育實業不進步的，也沒有政治不進步而教育實業進步的。自消極方面說，教育家實業家苦心孤詣日積月累得來的成績，壞政治一刻的工夫，可以將他掃蕩得乾乾淨淨；自積極的方面說，壞政治如果存在，斷不容教育實業得有進步的機會。我說這句話，並不是灰教育家實業家的心，也並不是不將教育實業放在眼

裏，我只要證明政治及於教育實業的影響，使一般從事教育實業者不要忘了政治。我們先最要明白的，政治是什麼東西？政治二字，經了學者不少的解釋，我以為最顯明最切要的只有一句：便是政治所以爲人民生命自由等等之保障。在君主專制時代，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是自己不能保障，而靠君主爲之保障的，所以君主賢明的時候，人民便靠泰山一般，安然無事；君主昏暴的時候，人民便受君主的蹂躪，叫苦連天，無所逃命了。人民上了這種老當，知道把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交給人去保障，是危險的，所以把保障之權收了回來，自己來做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的保障。這便是民主政治。若是國體雖號爲民主，而實際上政治權力全操在腐敗的官僚和暴橫的軍閥手裏頭，那民主便空有其名了。實際上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已經不由自主，而操在那些官僚軍閥手裏頭了。不向他們手裏頭，一把的奪了回來，生命自由等等尙且不由自主，還有什麼教育什麼實業可以講呢？不嫌瑣細的說，一國的收入，人民滴滴汗滴滴血所匯合而成的一國的收入，全放在官僚軍閥的荷包裏，試問教育家拿什麼做科學的設備呢？自然只好拿粉條黑版講科學了。物質進化的方面，還有指望麼？至於精神方面，只怕集會出版的自由，

也不能得着，更不用說實行了。精神進化的方面，也只好和東晉人清談似的。過這一生一世了。教育如此，實業可知，算來算去，除了掛外國的旗，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竟沒有第二個方法，這也不忍多說了。我們如果知道，教育和實業，是羣衆所缺乏的所需要的，便更要知道，教育和實業所缺乏的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所以凡是熱心於教育和實業的人，同時不可不熱心於政治，使眼前的壞政治，變成好政治，好政治的最少限度，是人民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到那時候，人民纔能將他的生命與自由等等，去發展教育和實業，故此教育實業的發展，是在好政治實現以後的。

如今要問我們如何能得到好政治呢？在民國以前，國人對於這問題的解答，已不一致，有些主張用革命手段的，有些主張用非革命手段的，這非革命手段，便是所謂立憲派的口頭禪，我們問他道：「你的『憲』是要誰去『立』呢？」自然是要人民去立的，那麼，人民在沒有解除壓迫以前，如何能得到立的機會？所謂解除壓迫便是革命了。你一面要人民立憲，一面又要人民不革命，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他始終沒有解答，所以到底革一回命，纔得到中華民國的臨時

約法。然而國人裏頭，用非革命手段可以得到好政治的夢想始終沒有拋卻。所以民國六年夏間督軍團作反，毀棄約法，西南起了護法軍的時候，北京有一部分政客，便曼聲的說道：「我們是立憲的國民黨，不是革命的國民黨。」他們說了這話，便躲開了護法軍的關係，安心樂意的在北京腐敗官僚裏頭，成功了蛆蟲化。他們的用心如何，此時不去說他，只是他們看得憲法是一件事，革命又是一件事，絕對沒有因果連帶的關係，那真未免過於穩健了。對於國意是如此，對於省憲也是如此，所以什麼國憲咧，省憲哪，在人民看來，是一張絕無意義的具文，卻是在人民之敵看來，卻是一種極有興味的裝飾品，可以隨時拿來遮掩他無量數的罪惡的，若要憑藉這麼樣的立憲，來得到好政治，真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了。老實一句話，憲法是革命得來的結果，不是革命的替代品，以爲立憲可以替代革命，是絕對的虛偽，不但是錯誤，而且是罪惡。

非革命的手段，除了立憲說而外，還有好人政府說。我在此表明一句：主張好人政府說的，有些是我的朋友，我如今批評這一說，並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不過我不能不照我良心的判斷，直說出來。我以爲這一說，比較立憲說，是進一步的，立憲說是祇要有「憲」，不管什麼人去「

立一人民不能立，那麼，蔣州政府去立也好，把持中央的大軍閥去立也好，把持一省的小軍閥去立也好，所以他的結果是喚起假立憲的罪惡。好人政府，卻能注意於在政府裏的是什麼人，能標明在政府裏的，必須是好人。這不是已進一步麼？只是他所短的，是沒有估量他所謂政府的價值，可憐得狠，他意中的政府，不是以人民爲基礎的，却是以一種特殊勞力爲靠山的。這一種特殊勞力，混名是太上政府，他意中的政府，對於這太上政府，國務總理不過是一個紀綱之僕，國務總長，不過是一羣管賬的，或是跑腿的，只怕還跟不上呢。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價值，却要大把的將些好人塞在裏頭。可憐得狠，那些好人塞在裏頭之後，都變成壞人了，至少也變成無用之人了。好人政府的作用，在哪里呢？須知這太上政府，除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將他打破，生息於太上政府之下，以太上政府爲靠山的，却想要矯正太上政府，真真是鯁膺當軍的故智了。而且這太上政府，還有個太上政府在他的上頭，太上政府對於他，已是一重奴隸，政府對於他，便是二重奴隸，不用說矯正，連趨奉還來不及呢。老實一句話，政府屈服於軍閥之下，軍閥屈服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在這屈服復屈服的狀況中，要想發生好政治出來，

比緣木求魚，豈不更難十倍。所以好人政府，終於是壞人政府或是無用人政府的命運了。

這樣說來，我們欲得到好政治，至少要經過兩番工作，一是打破軍閥的工作，一是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工作。這兩種工作，便是革命。在革命未成功以前好政治是不會實現的。

如今要問革命如何能得到成功呢？上頭所述，羣衆所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好政治，欲得到好政治，惟有革命，然則革命兩個字，真是今日羣衆求生存的不二法門。全國人民，無論是教育界實業界以至等等界，都應該同心一德，向革命那條路，大踏步的走去。如果這樣，我敢信革命早已成功了。只是這不過是一個理想，自有人類以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沒有一次，是全國人民一齊奮起去做革命的。起頭的時候，總是止有少數的人，看準了羣衆的缺乏和需要，奮不顧身的，爲革命的提倡者，其始不惟不能得羣衆的同情，而且反博得羣衆的怨恨和詛咒。爲什麼呢？就是剛纔所說，羣衆的缺乏和需要，羣衆自己還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同情何自而來呢？一直到羣衆漸漸的知道了，也就漸漸的有些同情於革命的了。只是在羣衆裏頭，還是極少數的，在那時候，如果革命的敵人，力量雄厚，立刻將他擊破，他於擊破之後，再團結起來，數量

必然加增，這還不必耽心，倒是革命的敵人，力量如果脆弱，一時就被他推倒，他推倒敵人之後，反而自己有些站不住了。何以故呢？那時候的羣衆，知道革命爲羣衆所缺乏所需要的，還是很少，同情於革命者，還是很少，爲羣衆而革命的人，得不到羣衆的同情，如何能得到羣衆的協力，於是反革命者乘間而起，羣衆對於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及於羣衆之利害如何，還沒有弄得清楚，自然便等量而齊觀，再加以反革命者，對於羣衆用些迷惑的工夫，羣衆的同情，反而傾向於反革命者了。在那時候，革命者宛如孤軍突入重圍一樣，敵人的包圍，一步緊似一步，而自己的後繼，竟至於踪跡全無，於是灰心者便成了潰卒，變節者便成了降兵了。一場革命的失敗史，也就於此結束了。所以革命的時候，所怕者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革命的挫折和失敗，不是原因於敵人之打擊，卻是原因於羣衆之不了解。我如今將試十三年中國革命之經過來，證明一下。中國的革命，倡始於孫中山先生，經二十餘年之奮鬥，方纔得到辛亥的結果，只是辛亥的結果是什麼呢？三民主義，在辛亥之役，成就了沒有呢？民族主義所要求的，一是國內諸民族之平等，二是對於世界中國民族之獨立，自從清帝退位五族共和，民族主義之第一目的，可以

說是達到第二目的，卻還沒有開展呢。至於民權主義，僅僅掛起了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民生主義，便連萌芽都還沒有，這樣的結果，總算是微乎其微了。然而這微乎其微的結果，已經是極不容易的。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上流行一種標語，就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這種標語，不但革命黨人極力宣傳，便是各種社會，也同聲肯定；在當時成爲一種不可抗的勢力，根據於這勢力，所以有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成就。滿洲末造，傾注全力於練新軍防家賊，然而他所練的新軍在南方的，都受了「不要爲異族殺同胞」的感化，成爲反正的軍隊；便是在北方的，也不免多少受了這樣的暗示，以致搖動了軍心；於是練新軍防家賊的政策，結果是適得其反，簡直可以算是練新軍以自殺了。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可以得一證明。然而「不要爲異族殺同胞」的標語，不是倉猝之間製得出來的，歷史的留遺，和環境的壓迫，使革命黨人的宣傳，能鑽入羣衆的耳裏，喚起了他的自覺，真不知經過了多少浸漬醞釀的工夫呢。其他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宣傳，在那時候，比較起來，是沒有同等的質量的，所以也不能有同等的效力了。試看元二年間，革命黨人，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有所動作，不但不能得羣衆的協力，反而惹

得羣衆的憤慨，被袁世凱看出破綻，便利用羣衆的憤慨，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辛亥之役，革命黨人驅逐滿洲，非常之快；癸丑之役，袁世凱驅逐革命黨人，也是非常之快；可見得革命黨不是失敗與袁世凱，還是失敗於不了解的羣衆呢。革命黨所怕的，不敵是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癸丑之役，革命黨人看出袁世凱是要背叛民國的，所以有討袁之舉，因為羣衆的不了解，以至於失敗。三四年間，繼續討袁，都是繼續失敗，直至四五年間，袁世凱顯然的背叛民國做皇帝了，於是羣衆裏頭，漸漸的知道革命黨人的標榜討袁，不但是「一種兇見，而且是一種萬不得已之所爲了。辛亥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不要爲異族殺同胞」丙辰之役，社會上流行的標語是「已經是民國了，如何又要做皇帝」。這兩種標語，有同等的效力，前一種標語，能使清帝退位，後一種標語，能使洪憲帝制取消，後一種標語，也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至少也可說是由二年至五年間，無數革命人的心血頸血，浸漬醞釀而成的。丙辰之役，袁世凱所有的兵力，較之癸丑之役，更爲雄厚，癸丑之役，他能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丙辰之役，革命黨人和向來非革命黨人，一齊的立於反對袁世凱的戰線上，袁世凱不但不能打破他，

反而自己衆呼親，終於做了塚中枯骨，和他的祖宗袁術地下相逢，做個愁人說與愁人道了。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於此又可以得一證明。辛亥之役，社會上以爲清帝退位便完了事，丙辰之役，社會上爲袁世凱取消帝制，便完了事，一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所必須的工作，都撤在腦後，有人要求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羣衆對於他，表示冷淡和喧厭，和元二年間，竟差不多；因爲這樣，所以一個袁世凱死了，無數的小袁世凱，依然存在，宛如董卓死了，李傕郭汜樊稠張濟一濟出來，他們的撒潑，比董卓還要兇些。他們以爲袁世凱的一生，都沒有錯，所錯的，只是做皇帝一樁事，他們祇要不犯此着，便做什麼都不要緊的，於是亂糟糟的，一直糟到今日，還沒有個收拾。我們試想，他們的方量，能比袁世凱大嗎？他們的手段，能比袁世凱高嗎？何以袁世凱不能生存於丙辰之役，他們卻居然能生存至於今日呢？若不是社會故意縱容他們，他們何至於此。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經過了元年和五年的覆轍，國裏頭有知識有思想的人，都向革命黨人嚴重的責備，說元年之役，不應該與袁世凱調和妥協，五年之役，不應該與一班小袁世凱調和妥協，以致革命事業不能貫徹，而內亂

反致延長；這嚴重的責備，可以證明國人知識思想之進步，和證明國人對於革命關係之親密，革命黨人當然是甘心承認的，也當然是勉力改過的。只是六年以後，護法之役，其結果又如何呢？護法之役，起於六年夏間，迄於十一年夏間，時間的經過，比起辛亥之役，延長得多，用兵的區域，比起前兩役，也擴大得多，似乎那及於羣衆的影響，自然比較的更爲深切著明了。十一年六月初，吳佩孚襲用袁世凱以來傳統的政策，贊成護法，黎元洪入京，取消六年解散國會之非法命令，表面上似乎是全然服從革命黨的主張了，裏頭卻是和袁世凱的贊成共和一樣用意。那時候，革命黨的態度，該怎麼樣呢？諸君總還記得：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有一篇宣言，這宣言的內容，先是對於直軍將士之贊成護法，表示欣慰，隨後便主張把現有兵士之一半，改爲工人，作爲停戰條件，把全數兵士，改爲工人，另編國防軍，作爲和平統一的條件。這宣言的意義，非常嚴重，可以算是民國以來第一篇吃緊的文字，也可以算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安危治亂的關鍵。何以故呢？剛纔不是說過，國人歸咎元年五年兩役之調和妥協麼？元年的時候，革命黨人和袁世凱有對抗的兵力的講和之後，歸於統一，南京留守，將所轄的各軍，大裁特裁的，裁贖了第八師的

一師；擴陳都督，將十餘萬民軍裁贖了二師一旅；而袁世凱呢，卻在北方，招兵不已，還待着大借款來擴充軍實，所以未講和的時候，革命黨手裏拿着一把刀，袁世凱手裏也拿着一把刀，講和以後，革命黨將手裏的刀，交給袁世凱了，袁世凱却將兩把刀都拿起來，把革命黨殺了下去。五年的時候，也是如此，平和咧，統一咧，無非哄革命黨人將手裏拿着的刀，交給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就拿這刀，來殺革命黨人；這樣的結果，不是革命黨的倒臺，却是國民的倒臺。因為第一次革命黨失敗之後，洪憲帝制便跟着出來；第二次革命黨失敗之後，督軍團造反便又跟着出來了。如今孫中山先生宣言的用意，便是對於前兩次的覆轍，謀一個矯正的方法，他注意於和吳佩孚商量，我的刀如何安放，你的刀如何安放，安放之後，彼此都不能隨意的便拿出來，這纔真正是和平，真正是統一。國人如果想起了元年及五年的往事，念及六年以來的創鉅痛深，料得定是一致贊成這宣言的辦法，而且是一致督促其實行的。誰知不然，一萬個不然，那時候的輿論，對於這宣言，不是全不理會，便是冷嘲熱諷的說道，「你護法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鬧些什麼呢？是不是還戀着些什麼呀？」代表全國知識界的，是學界，代教全國學界的，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一班教

授，便致電孫先生，說的是：「護法成功，應即下野。」全國最高的學府，還這麼說，其他可想，於是潛伏在北伐軍背後的一班驕兵悍將，平日還是有所憚而不敢發的，至此得了題目，便一哄而起的「請孫下野」了。六年以來，護法軍的根據地，便摧毀無餘了；曹錕的賄選運動，便從此開始了；一班自稱國民代表的國會議員，便戢戢然的趕入豬圈子裏了。到底這一次革命黨的失敗，其原因在哪里呢？從前兩次，說是失敗於調和妥協；這一次，是不調和不妥協了，何以仍是失敗，而且失敗得比前兩次還迅速，還凶慘？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是失敗於吳佩孚麼？不是，那時候，北伐軍還沒有和吳佩孚接仗呢！是失敗於一班造反的驕兵悍將麼？也不是，那時候一班驕兵悍將，分明是還有所憚而不敢發呢！算來算去，除了失敗於羣衆的不了解，沒有第二樣說法。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於此又得一證明了。以上種種，都是十三年來中國革命經過的事實，革命和羣衆的關係，於此已可以完全顯出。待羣衆了解，然後革命，不過是一個理想，而羣衆不了解，革命不能成功，又有許多經過的事實來證明其不謬。然則革命黨，惟有一面自己努力於革命，一面努力於求羣衆的了解，革命運動不必待羣衆了解而

後開始，卻不能不待羣衆了解而後成功。

如今要問如何纔能得到羣衆呢？國內的軍閥和國際的帝國主義，如此勾結，如此壓迫，真是存亡危急間不容髮，若待到羣衆慢慢的了解過來，然後革命成功，那真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了。所以我們今日，不能不想出一種催促羣衆了解的方法，也就是縮短革命期間的方法。這方法第一要問的，我們是不是要爲羣衆利益而奮鬥。如果不是，那就與羣衆毫無關係，或者竟是羣衆的敵人，什麼也是用說了；如其是的，我們終可以得到羣衆的了解。於是第二要問的，我們如何能使羣衆快快了解。須知羣衆的意思，是散漫的，是暗昧的，這是進步遲慢的總因；我們如果要催促他進步，須要將他的意思，整理起來，顯著出來，我們能夠集中羣衆的意思，纔能夠集中羣衆的力量；於是第三要問的，我們如何能集中羣衆的意思和力量。我們可以答道，除了結合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沒有第二個方法。關於這一層，一時也解釋不盡，中國國民黨已有了宣言和章程，民國日報因此發行了一種特刊，將宣言和章程，載在上面，還有幾篇論文，附在後頭，都是對於這一層，加以解釋的，我也不用複說了。

我所講的大意是如此，至于如何去解除這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對於國事之痛苦呢？在與全國人民，尤其在於全國人民裏頭有思想有知識的人了！

三月一日在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總會演

說辭

今日是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這是國民會議前途可紀念的日子，也就是國民革命前途的日子。會員諸君，有些是在北京的，有些是從各省來的。諸君數月以來，苦心孤詣，不辭勞瘁。方纔得這些結果，兄弟對於諸君，實在抱著無限的敬意，無限的感念。

兄弟知道諸君此時一定不期然而然的一種感恩。這感是什麼呢？就是對於發起國民會議的孫先生的感念。孫先生現在病得極重，不能起床，兄弟自一月二十六日以來，一切講演之約暨社會酬應，都已謝絕。今日離開孫先生病榻，來赴諸君之約，臨來的時候，孫先生在病榻上，以微弱的聲息問，兄弟往那裏去。兄弟答以赴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的開幕式。

孫先生從痛苦的病狀中，微露笑容，點頭說道：「甚好。」諸君知道，諸君此時，感著發越國民會議的孫先生，而先生此時，也正感想着爲國民會議努力的諸君呵，孫先生此次北來，一心一意的，要和北方同胞，說國民會議的必要，與其運用的方法。無奈孫先生如今病了，不能和諸君見面細談。孫先生的意思無人敢爲代表，兄弟祇能以其所見揣測一下，爲諸君告。爲什麼要開國民會議呢？國民會議何以爲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呢？這些問題，關係至爲重要，不能不先爲解答。中華民國，主權在民，載於約法，其實這不過一句空話罷了。十四年來，主權何嘗在民，只不過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裏，和國內軍閥手裏。因爲這樣，中華民國十四年來，有名無實，人民痛苦不堪言狀。人民深知道這些痛苦，都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所賜，若不能驅除帝國主義和軍閥，必不能解除痛苦，所以一致的要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之目的，簡單明瞭，便是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所以要開國民會議的緣故，是如此，國民會議所以爲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也是如此。

國民會議之所以爲國民會議，全靠他的構成分子，眞真實實，都是國民。不然，國民會議必

是冒充的，不是真實的了。孫先生的宣言，所列國民會議之構成分子，是現代實業團體、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各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軍人、政黨。以上種種，方纔可稱為真真實實的國民。以這樣的構成分子，來構成國民會議，方纔可稱為真真實實的國民會議。這樣的國民會議，方纔能盡他應盡的責任，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於人民，何以故？因為以上種種的國民，都是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利益相反的，不能兩立的。惟其這樣，所以能盡他應盡的責任，舉些例來說，現代實業團體中，如果想起中國實業何以不發達，何以不但不和外國實業在世界上競爭，並且不能和他，在中國競爭，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外國人在中國為特權階級的緣故，這是關稅權在外國人手裏的緣故。於是現代實業團體和帝國主義者利害相反，便可明白了。如果再想起壓在人民頭上的政府，何以不幫著人民，向帝國主義者抗爭呢，何以反幫著帝國主義者來壓服人民呢？這是軍閥竊據政府，託庇於帝國主義者以自存的緣故。於是現代實業團體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可明白了。現代實業團體如此，商業也是如此。

農民如果想起農地何以日即荒蕪，農村何以日即破壞，農民資本何以日即拮据，農家生活

何以日即憔悴，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工業政策來施行經濟侵略的結果。工人如果想起手工業何以失敗，失業者何以如此之衆，何以將人類的身體來做機器的奴隸，大而外國資本家，小而中國資本家，何以能將工人出的血汗，等於鍋爐內燒著煤熱力，將工人出了血汗的身體，和撥出鐵爐外的燒過的煤渣，一樣看待，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施行國際資本侵略的結果，如果再想起壓在我們頭上的政府，還正在依附著帝國主義的勢力，來束縛我們驅使我們魚肉我們，於是農民工人和帝國主義者利害相反，可以明白，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可以明白。

教育家和學生，如果想起教育權何以如此旁落，外國文化侵略政策，何以如此橫行無忌，教育經費何以如此缺乏，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之高壓政策和軍閥之攘奪政策愚民政策所做出來的結果。於是教育家和學生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就可以明白。

至於軍人呢，雖有時被看做軍閥之直接工具，帝國主義者之間接工具，然軍人不是從天上吊下來的，依然是從田間來，或是從失業工人中來，或是從教育界學界中來。以上種種人，所受的痛苦，便是他的痛苦，一旦明白過來，必然沾在以上種種人的方面，替以上種種人出力，與帝國

主義者和軍閥作對。不見全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已明明白白的，標出他的旗幟來了麼？軍人如此，推之政黨，也是如此。

如此說來，用以上種種人，假國民會議的構成分子，必然能盡他應盡的責任，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換句話說，這是他們拿着他們自己的主權，替他們自己與利除害是何等的親切，是何等的正當，所以他們自己要開國民會議所以國民會議爲解決時局之惟一方法。

如今國民會議雖然還沒有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已是開幕了。還可以說國民會議成立的先兆。兄弟想起建設中華民國的原因，和中華民國的大道理，將主權在民四字，爲諸君祝。

「平和」「奮鬥」「救中國」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追悼孫總理大會)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躺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溷了，一種微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平和！」「奮鬥！」「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裏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平和！」「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法與條理。癡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

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却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這真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正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平和」與「奮鬥」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卻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平和」。孫先生的學生「奮鬥」爲什麼呢？是爲「平和」而「奮鬥」。孫先生平日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平和的真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平和，是如此的，祈求平和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鬥。三民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平和是仁者的心事，奮鬥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老子說「慈故能勇」，都是這個道理。爲平和而奮鬥，以奮鬥求平和，平和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鬥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二六

足以困孫先生呢？「平和」「奮鬥」「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平和」「奮鬥」「救中國」做法。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汕頭建國粵軍總司令部行營舉行第三次孫大元帥紀念週，時汪精衛先生適在汕頭參與祭禮，並向衆演說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兄弟由北京來得參與這裏第三次的週祭，承總司令的囑咐，要兄弟向諸君說幾句話，兄弟謹把這一次到北京去的經過，簡單報告。

兄弟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隨大元帥自廣州出發，十七日到上海，大元帥決定自己率領幾位同志，繞道日本以赴天津，命兄弟先行入京，並在津會面，及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兄弟接著，這時候大元帥已發病了。但是大元帥還不肯休息，雖然病臥在床，而我答函電，接見重要同志及賓客，仍是每日不斷。至三十一日入京以後，病勢日見沉重，便不能躬親庶務了。一月二

十六日入協和醫院受手術後，以至於三月十二日易簣，心神雖然始終不亂，但病勢至此，不能再以別樣事情，擾其心曲。故此這幾個月內，實沒有什麼事可以報告，這是實可痛心的。

這一次大元帥北行之目的，曾經鄭重宣言，一是開國民會議，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諸君知道，開國民會議，是打倒軍閥的第一着手，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第一着手。開國民會議，國人是沒有疑問，廢除不平等條約，國人便有些疑問，似乎是外交問題，總要在內政清明之後，方纔有解決的希望。如今內政還沒有整理，便驟然說廢除不平等條約，似乎太早，殊不知內政所以不能清明，是因爲軍閥把持，而軍閥所以能把持內政，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在後擁護。徵之往事，袁世凱所以能帝制自爲，是因爲癸丑之役，能打倒國民黨，而之所以能打倒國民黨，是因爲得了五國銀行團二萬萬五千萬元的大借款。袁世凱得了這一批大借款，內用以充實自己的軍隊，外用以收買一般變節的國民黨員和懷貳心的國民黨軍隊，所以釀成癸丑之役，以爲帝制自爲的張本。以後如馮國璋徐世昌曹錕之流，每逢要做反革命的事業，和國民黨作戰，沒有一次不求助於帝國主義者，而帝國主義者沒有一次不助他。所以在反革命的方面，他特

著有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便全然不顧國民反對，將帝國主義者所借給的款項，擴充軍隊，把持政治，以與國民革命爲敵。而在革命的方面，同時向軍閥及帝國主義作戰，已經吃力，再加以帝國主義者爲軍閥作揄揚，向國民黨作種種誣譏，淆惑國民之視聽，以致國民革命之氣勢，爲之阻滯不少。十四年來，中華民國沒有建設得好，甚至十二三年間廣東處於四面受敵之地位，都是一種原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軍閥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國亡無日，還說什麼內政清明，豈不是夢想？所以打倒帝國主義，不但是中國對外國自由獨立的必要工作，這些道理從前國內人士往往沒研究清楚，自從大元帥苦心提倡開導之後，方纔漸漸的明白。

開國民會議是奪取軍閥所把持著的政權，還之國民。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毀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施行侵略的武器。故此大元帥的主張，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不願聞的。當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的時候，天津的法領事，竟不許中國各界人士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開會歡迎，還揚言不許大元帥通過法租界。這可說與大元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針鋒相對。而中國的官僚，反以爲這是大元帥不善外交所致，這是何等的夢囈。過了幾日之後，京津一帶，

紛紛傳說，駐在北京的外交團，要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大元帥聽得，極爲注意。適值交通總長葉恭綽和善後會議籌備主任許世英來見，大元帥詢知實有其事，當時極爲震怒。諸君啊，大元帥所患的肝臟重病，據各國醫生所說，現時世界還沒有治這病的藥，我們不敢說這一番震怒，是大元帥致死的根由，然總是大元帥添病及促其生命的一個原因，這是我們所永永不會忘記的。當時兄弟因爲大元帥震怒，極力勸止，并自任與葉許兩位切實商量，葉許兩位已經答應向臨時執政商量補救方法。一是在答覆照會裏頭，聲明政府同意於國民修正條約之要求。二是外交次長於答覆照會遞交時，口頭聲明政府對於孫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完全同意，然其結果，答覆照會裏頭，僅僅說了一句含糊的話。至於口頭聲明便至今也杳無聲息，尊重不平等條約，果然做了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了。須知道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者加於中國的一條鐵練，自從滿洲政府套上了這條鐵練之後，至今總沒有掙斷；而且每逢北京政府首領登台的時候，各個帝國主義者，必然要使他認識不平等條約之天經地義。例如民國元年八月的時候，駐京英公使朱爾典向袁世凱提出西藏獨立的要求，並以之

爲承認民國的交換條件，我們想想甲午的中日戰爭，便是因爲日本要求高麗獨立而起，那時候中國尙不恤出於一戰，而袁世凱竟以西藏獨立，爲取得英國承認他在民國的地位之交換條件。這是何等的勾當？又如民國十二年冬間，曹錕賄選總統的時候，駐京外交團，便以曹錕承認臨城案爲外交團承認賄選之交換條件，曹錕便也連忙答應，這又是何等勾當？帝國主義者於他們登台的時候，兜頭的給他們一條鐵鍊。他們爲怯著場台的緣故，便低頭受之不辭，早已成了北京政府的老例了。大元帥北行，以廢除不平等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受了一大挫折了。至於開國民會議呢，我們看了一月十七日大元帥選臨時執政的條電，便可明白，依大元帥在廣州臨時時的宣言，是以預備會議產生國民會議的。如今條電連預備會議的名稱也不爭執，只有臨時執政肯於善後會議之內容納現代實業團體，商會，農會，教育會，各大學生聯合會，軍人，政黨等代表，使國內各種職業團體得在善後會議之內，主張意見，大元帥便不惜犧牲預備會議的名稱，以贊成善後會議。這樣的讓步，已可謂到極點了。然而臨時執政對於這樣的讓步還不能滿意，只羅致一些未完全的職業團體代表來做什麼專門委員，且有發言權，無表決權，和上

海工部局的華人顧問一樣。主權在民的意味，消失無餘。大元帥北行，以開國民會議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又受了一大挫折了。

諸君啊！大元帥北行目的，受如此挫折，是在大元帥的意中呀，還是在大元帥的意外呢？依兄弟愚見，這是在大元帥意中的。大元帥於十一月十七日抵上海後，曾召集上海新聞界中人於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寓廬，宣佈北行目的，並且說道：「我抱了這樣目的而北上，我知道是會危險的，我只要國民明白，我便什麼都不管，我便什麼都不怕。」可見北行目的之受如此挫折，實是在大元帥的意中。然而國民的明白也在大元帥的意中。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元帥入京，市民歡迎以十萬計，三月二十日以後，大元帥靈柩停放中央公園內，市民來祭者前後數十萬人。他們不是來看熱鬧，也不是無意識的崇拜。其中大部分的青年學生、軍人、工人都認識大元帥的主義，至少也欽敬大元帥主張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用心。他們的意思表示，都可以爲證，兄弟敢說中國國民黨革命的氣勢，已在北方開展了。

當北方革命氣勢開展的時候，正有賴於大元之領導統率，而大元帥溘然逝去，這豈但是北

方人民的不幸，是中國的不幸，也就是大元帥的遺憾。所以大元帥在遺囑上，將生平未了的事，付託於後死同志，除了遺囑所載之外，在三月十一日夜，一息奄奄的時候，反來覆去的，只念著「和平」「奮鬥」「救中國」三句話。真真是一息尚存，不肯少懈，令人悲傷感激，至於無極！「救中國」是大元帥一生的志願，「和平」是中國將來的光明，「奮鬥」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和平是奮鬥的目的，奮鬥是求和平的手段，因為和平兩個字，不是偷生苟活，也不是醉生夢死。人類不互助不得謂之和平，不平等不得謂之平。互助和平兩個字，惟有互助平等方纔是真解。在這樣的不平等社會裏頭，不用奮鬥的方法，不能使不平等者歸於平，既不能平，和便無從說起。大元帥一生是一個極仁慈愷惻的人，同時是一個極勇敢強毅的人，惟其大仁是以大勇，故此和平奮鬥，是大元帥一生救中國的大本領。

兄弟常常聽得國裏頭的人，有些將大元帥比美國的華盛頓，有些將大元帥比俄國的列寧。以事功來論，中國國民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所以大元帥比之華盛頓列寧為有遺憾。就環境來論，大元帥所處的艱難困苦，尙非華盛頓列寧可比。美國獨立戰爭是華盛頓為統率，而美

國人民的獨立思想運動，醞釀日久，非華盛頓所提倡的。俄國革命運動，將及百年，至列寧而集大成。就列寧的成功看來，實是空前的偉大。然而列寧有深長的俄國革命歷史來做根據，這是他成功偉大的一個原因。至於大元帥呢，四十年前提倡中國革命，由播種而萌芽，而抽條，而發葉，都是他一手造成。在他人當這環境，只能做一些革命思想運動，而他却已從事於革命實行。這已是在歷史上找不著前例的，揆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例，他當然只能做一辛勤種樹的人。中國國民革命將來定然是成功的，可惜大元帥不及見了。當大元帥病勢沉篤，自知不起的時候，對於革命前途，抱著無限掛念，對於同志之能否繼續奮鬥，抱著無限掛念。在這時候，東江戰事接連不斷的捷報，實能使孫大元帥痛苦中得著些安慰。我們同志實在感激總司令，及各位將士的努力。我們同志更盼望總司令及各位將士，早日成功，俾大元帥遺囑上所屬望的——實現。

「國民感命」之意義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汪先生九月六日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學生會演辭)

本校自從蔣校長廖黨代表奉總理命創立以來，爲時不過年餘，第一期的畢業學生，已經隨着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黨軍，於今年東江之戰，廣州附近之戰，掃除反革命的勢力，最近又在廣州市鎮壓反革命派，解除反革命派軍隊武裝，成績燦然。第二期的學生，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參加上述各項工作，於今已告畢業，此後研究時代，告一段落，擔負責任時代，於焉開始，且日以加重，必能繼續上述各項工作，而使之擴大。兄弟對於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的前途，實在馨香以祝。

目前應該繼續的工作，第一是統一廣東。黨軍的目的，在全國而不在一省，但依工作的次序，非先將廣東統一，決不能着手於統一全國。證之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伐軍深入江西，連戰皆捷，而反革命派，在廣州蠢動，爲北伐軍後顧之憂，以致功敗垂成，可見廣東若不統一，是不能輕易進取的。以黨軍前此的成績而論，深信統一廣東的事業，必能由黨軍做成，而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參加此項事業，也必能和第一期畢業學生諸君一樣的勝任愉快，此可爲諸君預賀的。

剛纔我們同在一起，恭聽總理的遺囑，適囑的頭一句話，是國民革命。現在軍事委員會定各軍統一的名稱，也是國民革命。兄弟想今日如果說些泛常的話，不如將國民革命四字，提出來討論一下，作爲贈言，較爲有益。

國民革命，是整個的名詞，他的定義，總理在遺囑中，已解釋明白了。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何以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爲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呢？是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的唯一目標，便是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有疑議。帝國主義不倒，中國的平等自由，無從恢復，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建設，都無從說起，所以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實在是卑無高論，凡是有覺悟的國民，都能做到的。然而以前國民革命的時候，往往於一二重要條件，有所忽略，以致留爲後日的大患。例如十八世紀時候，歐洲各國，紛起革命，而其結果，將革命所得的幸福，歸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甚至取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樣的國民革命，不止於世界無益有損，即於自己的國家，也未見有益。試看歐洲各國，最近社會革命的

現象，及歐洲大戰時代的殺戮破壞，便可以明白。所以今日的國民革命，應該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有一種特色，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因為有三民主義的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擔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就部份來說，是中國的，就全體來說，是世界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有此二特色，所以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以上二特色，凡讀過總理三民主義的，都可以領略得到，而總理在遺囑上，更有簡單明瞭的說明。所謂「喚起民衆」便是第一特色之存在。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第二特色之存在。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此目的之方法，在喚起

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什麼叫做喚起民衆呢？民衆的最大部分，是農民工人，在未喚起的時候，農民工人，絕不知道國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喚起以後，則農民工人必成爲國民革命之最大勢力。因爲農民工人的本身利益，與帝國主義，是絕對衝突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帝國主義之要殖民地，其最大目的，無非掠奪農民血汗得來的農產物，以爲原料，掠奪工人血汗得來的製造品，以爲商品，所以有了農民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至於商人，普通看來，似乎與農民工人利益相反。其實在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商人，除買辦階級外，其本身利益，也和農民工人一樣，於帝國主義，絕對衝突，絕對不能妥協。因爲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商人獨能除解，而且商人所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之痛苦，較一般人民，更爲深切。帝國主義資本之壓迫，如金融操縱等等，政治勢力之壓迫，如關稅協定等等，皆是使商人永無獨立發展之希望，故商人於喚起以後，必能和農民工人一樣，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知識階級，他所受的經濟之壓迫，沒有農民工人商人這樣痛切，那就全仗他良心的壓迫了。國民革命時代，最要緊的，是集合全民衆的勢力，向

於一個目的而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這個本是自然的，因為他們所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們的需要也相同，不過不經喚起，便不能集合，所以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是國民革命的最要方法。俄國大革命的當初，托爾茲基一派，專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運動，列寧則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農民運動，則農民必於工人階級分離，使革命的勢力，爲之薄弱，所以他注意農民運動，引他們參加革命，遂做成俄國大革命絕對大多數的勢力，使革命的基礎堅固不可動搖，這樣的革命辦法，是我們所當以爲法的。以上理論，可歸著爲三點：（一）革命本是爲民衆的；（二）喚起民衆自己利益而革命；（三）革命得到民衆的利益。

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兩種：（一）是和我們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近如安南高麗，遠如印度，他們求自由求平等的需要迫切，和我們相同，他們的敵人，也和我們相同。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工作，我們和他們的聯合，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二）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而現在已能以國民的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的。例如蘇俄，他已使本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

更進一步，要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如列寧所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革命的目的，是爲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故此革命的義務，是要爲人類大多數的利益而奮鬥。於這一個目的之下，聯合起來，同盡義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是十五萬萬，中國人數四萬萬，在全世界人數中，占了四分之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是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主義。

總理的遺囑，如日中天，應該讓人人去體認，不應該由一個人去解釋。兄弟如今將自己一個人的體認，敘述出來，與諸君的體認，互相印證，可以曉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如此緊要，如此偉大，總理所付托於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我們得了總理的指示的一條光明的大路，使我們生出無窮的興會。我們想着我們所負的責任，使我們生出無窮的勇氣。

諸君啊，諸君於今開始負着這責任了，向着那一條光明的大路開始前進了，世界終是光明

的，中國的國民革命，終是成功的，只看我們的努力。

一個人的理想，是無窮的，而生命是有限的。兄弟前天在廖黨代表追悼大會曾經稱述陳英士先生以至廖仲愷先生為黨犧牲的事實，以陳英士先生之精明強幹，只做到帝制洪憲摧敗，便一瞑不視。以廖仲愷先生之至誠無息，只做到楊劉掃滅，便一瞑不視。兩位先生的思想，至少也周於全世界，而其生命只限於一部分事業的成就。我們此後的生命，最多不過幾十年，少者幾年，最少者幾月，皆未可定。只要在世的時候，為國民革命，盡心盡力，做過一些工作，那麼，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不枉為人一世也。諸君啊，在諸君今日畢業的時候，兄弟敢以至誠為諸君祝。

繼續總理遺志！

繼續廖黨代表工作！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自由平等萬歲

世界上一切民族自由平等萬歲！

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八月卅一日在黃埔中國國民黨立陸軍軍官學校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日爲黨代表廖仲愷先生開追悼會，校長囑咐兄弟說幾句話，兄弟原想將廖先生的歷史敘述一回，但爲時間起見，祇將最重要的幾點，簡單的敘述一下。

廖先生一生爲黨盡力，他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他所以能爲一般同志的領導，由於他平日人格的修養。我們要認識廖先生的人格，我們可以看見他最顯著的兩點。

一是勤勞，他平日工作，至少十二三小時，至多十六七小時，是人人人都知道的。他還有一樣，他無論如何忙法，到臨睡的時候，必要看書，這已成了他自然的習慣，所以他不但對於職務上精神緊張，便是他的學問智識，他能隨時代以增進，這一點是我們不可忽略的。二是廉潔，民國以來，他

汪精衛先生演講集

四一

屢次做財政當局，而他的操守廉潔，始終如一，身死之日，家無餘財。人人知道廖先生在東山百子路有屋一間，但深知底細的人，便可說出這一間屋是他夫人由他母家所得私畜積聚下來的。大約廖先生前前後後，至多幫過幾百元或千餘元，他有這廉潔的操守，所以能保持他勇往的革命精神，歷久不拔，這一點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廖先生因為有勤勞和廉潔的兩種美德，所以能為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是廖先生平日人格的修養，至於廖先生對於職務的美德，更有兩樣，使我們容易認識並且永遠不會忘記。一樣是對於總理和黨的決議，忠實服從。廖先生為黨盡力，已有二十多年，他平日在總理左右時間最多，我們看見總理發一議定一策，廖先生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時總理採用廖先生的意思，有時總理堅執自己的意思，或採用別人的意思，廖先生對於決議，是一樣忠實的服從，忠實奉行，絕沒有因自己的意思，不蒙採用，而生出隔閡。不但對於總理如此，對於黨的決議亦如此，這樣紀律的精神，真是團體行動的唯一軌範。一樣是對於個人的出處進退，純然以公事為主眼，不參一毫私見。舉例來說，去年春間，廖先生任廣東省長，及

中國國民黨改組，廖先生擔負工作最多，覺得不能兼顧，他便辭了廣東省長，担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工人部長，及軍校黨代表等職。夏間總理因省長難得其人，命廖先生復任，廖先生覺得此時非兼顧不可，便也不辭。及至秋間，商團作難，廖先生覺得不能行其抱負，便又決然去任，連財政部長財政廳長等職，一概不就，專心於中央黨務及軍校。最近政府改組，一般同志，要他擔負財政當局責任，他覺得無可推諉，便擔負起來。由此可見他的出處進退，完全根據着總理和黨的決議，及自己一身如何纔有利於黨，便如何做去，他看得自己一身如黨內的一副機器，他的出處進退，於他自己個人是沒有一毫成見的，這真是爲黨服務的模範。許多的人，對於自己的出處進退，縱然看破了權位勢利之爭，然而往往忘不了意氣之爭，這一點意氣之爭，往往誤了許多大事，對於廖先生這般態度，真當愧死。廖先生對於職務，因爲有這兩樣美德，所以能公爾忘私，不知有己，祇知有黨，所以能爲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雖然極其簡略，但是廖先生公正純潔的精神，已經可使我們認識。廖先生因爲有這樣公正純潔的精神，所以能有這樣勇往無前的氣魄，來擔負這樣重大艱苦的責任。他這

同的死，完全是爲肯負責任與能負責任而死，死廖先生的，不是欲置廖先生的個人於死，是欲置廖先生所盡力的黨於死，是欲置廖先生所領導的一般同志於死，所以死廖先生的，不是廖先生個人的敵人，是黨的敵人，是一般同志的敵人。

敵人爲甚麼要置廖先生於死呢？總括說來，是要妨害中國國民黨的進行，切實說來，是要妨害改組以後中國國民黨的進行。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敵人所以要殺廖先生，是因爲廖先生在於中國國民黨改組期間，担負責任最多，所以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的說道，廖先生是爲改組中國國民黨而死，廖先生是將自己的生命，換取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

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呢？兄弟在本校擔任講授黨史，兄弟所講授給諸君的一個最重要觀念，便是時代觀念，用種種理論與事實，證明革命與時代之關係，證明革命是因於時勢之需要而發生。如今要講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也要先將那時代的形勢敘述一回。

民國十二年間，中國的時勢，是曹錕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示和暗助，推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而自己來做英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種傀儡的最大任務，是掃除國內一

物革命派。所以他看得廣東革命政府如同眼中釘，用大批借款，大批賣國得來的軍械，指使手下一般用慣的嘍囉，從北江方面，攻打廣東。同時指使手下一般新附的嘍囉，從東江，西江，南路，一齊攻打，要把革命政府，困在中心。外面的形勢，已是如此，革命政府的內部又怎樣呢？楊希閔和劉震寰口口聲聲說是追隨總理，實行革命，其實是借着這名義來做盜賊的勾當。水滸傳中的晁蓋說時，選借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要實施這兩種方法。實非容易。第一要將革命的意義。明顯指出。第二要將革命的敵人。明顯指出。因為這樣。誰是真正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假革命？方纔分別得清楚。這便是中國國民黨所以要改組的真正意義。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總理在那時候。已有決心。在那時候。用十二分的努力。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即現時所謂黨軍。以為總理的臂助的是蔣校長，用十二分的努力，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將改組全黨的計畫，完全達到，以為總理的臂助。同時對於黨軍，為蔣校長的臂助的，是廖先生。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情形是怎麼樣呢？只看未改組以前，全黨奄奄不振，改組以後，至於

今日，不過年餘，革命的意義，在一般民衆中，已有普遍的宣傳，及明瞭的認識。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傀儡——大小軍閥——已成爲千夫所指，無所掩蔽，無所逃遁的了。一般民衆，尤其是農工民衆，都齊心一意的傾向本黨，加入國民革命的工作。本黨的進步，已爲世界所注目，不只在中國以內，無與抗衡，同時武裝的黨員，爲掃除國民黨山泊的名目，去偷鷄食，揚希閔劉震寰等，便是襲此故智。他們這種行爲，比之陳炯明公然對於革革，實行叛逆者，還要可惡！因爲公然的叛逆，是與革命分離，他的罪惡，與革命無涉。至於假借革命的名義來做盜賊，將革命掩護他的罪惡，幾乎使革命二字爲所污辱。他們擁護着總理，而所作所爲，全然與總理相反。他們做種種殃民的事實，使人民受種種的痛苦，同時使總理受種種的痛苦，總理兩次三番，對諸君所說的話，諸君總該記得。總理的不治之症，是他們所激成，總理是活活被他們氣死，如今想起，還要怒髮衝冠。諸君想想，在那時候一切的革命行動，都看不見了，除了總理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巍然存在，其他一切，都已黯然無色。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已到了存亡繼續的關頭。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起死回生的方法，只有兩樣：一是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

命假革命的黨員；二是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革命的一切障礙。先將盤踞東江的餘孽，完全擊破，繼將負隅省城的強寇，完全撲滅。這些都是數年以來窮凶極惡莫敢誰何的，自改組以後，纔能將他肅清。如此說來，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的的確確是有進步，沒退步，無論何人，不能否認。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既然是有進步，那麼，在組織期間工作最多，擔負責任最重的廖先生，當然為一般同志所推重，能領導一般同志猛向前進，只是同志越發推重，則敵人越發仇視。上頭說過，改組的動機，是要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要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由此可知真正革命的黨員和軍隊，既愛廖先生如手足，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必然恨廖先生如仇讎。於是他們自然而然的奔集於國民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之下，自獻其身，作為傀儡，以與國民革命為敵，以與領導國民革命的廖先生為敵。廖先生之死，間接死於帝國主義之手，直接死於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

這一班反革命假革命的醜類，受了帝國主義的唆使，謀死廖先生，他不說廖先生的存在，和他反革命假革命的生活，有所不利。他不說廖先生以嚴格訓練黨員和軍隊的結果，一般反革命的，日益窮蹙，一般假革命的，亦被揭去面具，現出原形，無處躲閃，因而恨廖先生入骨，他卻異想天開的，憑空做出反共產的口號。這種口號，正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上海香港一帶所極力宣傳的。他既然自獻其身，作為帝國主義的傀儡，當然有做應聲蟲的義務了。這還不足為意，最無聊的，是一般無所容心的社會，他平日也不知什麼是反共產，什麼是共產，也不知這中國國民黨，為什麼要改組，更不知道改組以後真正革命的反革命的假革命的當然要化分起來。不但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要排擠真正革命的，以維持他們虱處禪中的地位。但是真正革命的，也要清除反革命的假革命的，使此後的進行，能一致而活潑，這種化分，是改組以後必然的現象。他因為莫名其妙，所以看見改組以後的化分，認為一種不幸的分裂。聽見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便恍然的道：「哦，是因為共產反共產，鬧出來的。」這種聲浪，是助成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假革命的聲勢，中了他們的反間計，迷惑一般羣衆加入國民革命的趨向，遲緩了國民革命的進程。這

還不甚緊要，最痛心的，是黨內一般青年，意向是純潔的，氣魄是勇敢的。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担当，却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將國民革命一個意念，橫分爲二，這真叫做沒來由了。更可痛心的，是黨內辛苦培植的軍隊，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担当，國民革命前途之一切障礙，正要他們去掃除，軍隊的意念是要單純而堅毅的，國民革命是軍隊唯一的意念，真所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却也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生生的要他分裂起來。這是何等的庸人自擾呢！黨外的人，中了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反間計，還有可說，甚至黨內的純潔勇敢的同志也陷於反間計而不自知。所以廖先生在世之時和兄弟等幾個人說起來，總是搖頭太息說：「腐敗的已癩敗了，幼稚的如此幼稚，如何是好！」廖先生被刺之際，當場捉獲兇手陳順，問他的供詞，他說：「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又說：「打死廖先生之後，又可分得萬多銀子。」哼！這個因爲謀財而害命的兇手，他懂得什麼叫做共產。他懂得共產二字如何寫法。他懂得共產二字如何解釋。他公然說出「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的話，來掩飾他「打死廖先生之後可以分得萬多銀子」的罪惡。兄弟所以敢確實明白的對諸君說道：廖先生之死，是死於帝

國主義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他們是將反革命的口號，來掩飾他們無窮的罪惡，同時還誘至別人陷入於無窮的罪惡。當八月二十一日廖先生的遺體將入棺材裏的時候，他的夫人何香凝同志撫尸哭道：「我知道你沒有什麼掛心，最掛心的，是中國國民黨！」

這一句話，死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一定在這裡含淚點頭。我們一班後死的人，眼看著廖先生

慘死的遺骸，耳聽着廖夫人悲痛的絮語，分明看見廖先生前辛苦工作之後，搖頭太息的神氣。

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想想，你們有使廖先生掛心的沒有呢？

俄國同志鮑羅庭先生，有一日有一篇極沉痛真摯的演說。他先說七八年間俄國同志處

於四面包圍，竭力奮鬥的時候，曾得過孫先生精神上道德上的援助，使俄國同志看得見東方的

光明，引起了同志間互相援助的感情，所以纔有十一年間俄國代表越飛與孫先生在上海會見

的事，所以纔有十二年間他自己到廣東與孫先生會見的事。孫先生與俄國同志的結合，千言

萬語，千條萬理，而簡括說來，不外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因為中國今日，除了這樣，沒有第二

條生路。至於俄國同志，何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如此關切呢？因為中國國民革命，所對抗的

是帝國主義，俄國革命所要撲滅的，也是帝國主義，目的相同，當然互相援助。我們同志在今日裏，只要專心致志，做國民革命的工作，不必分心其他問題，因為我們同志，最多祇有數十年的命，在這幾十年裏，完成國民革命工作，推倒帝國主義，我們同志，早已安安穩穩的，睡在地下了，甚麼共產呢，不共產呢，自有我們的子孫，去解決他，用不着我們此時爲他操心，鮑先生這一篇演說，何等沉痛，何等真摯。這是明瞭革命的時代觀念，明瞭革命黨人在那時代，應該做什麼工作，纔能如此明白坦率的爲我們指點出來。

我們想想，我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呢？如其是的，如其是要三民主義實現的，則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實爲目前唯一的工作。「國民革命」四個字，在孫先生的遺囑裏，劈頭第一句，便說出來，跟着解釋道，「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不止給我們以標語，并給我們以標語的定義了。就民族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民族，將不能自主，以漸歸於淘汰。就民權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淪於次殖民地之地位，還有什麼民權可言。就民生主義來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國家財政，國民經濟，皆受帝國主義之操縱，一切民生政策，從何

說起。所以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必先要實行國民革命，推倒帝國主義，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工作，尤其是我們目前唯一的意念。一個革命黨人，關於革命的理想，是無窮盡，無止境的，而關於理想之實現，則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落後固不可，躡等亦不可。所以我們今日，除了國民革命之外，不必有第二個意念，亦不容有第二個意念，那些利用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來紛擾我們的意念的，正是帝國主義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陰謀毒計。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如果想對於廖先生的掛心，與以安慰，在今日的追悼會裏，在廖先生遺像的面前，喝破了這些陰謀和毒計，我們祇有一個意念，只有一個國民革命的意念，向着國民革命的一條大路，猛力前進。

各位同志，一黨裏頭，領導的人物，是由歷史做成的，少一個是一個。民國五年，死了一個陳英士先生，九年死了一個朱執信先生，十一年死了一個鄧仲元先生，這些損失，在本黨裏，是無可補償的。在那時候，諸先生死，總理仍在，一般同志，仍不失中心的提挈。如今死了一個廖先生，却在總理逝世未久之後，此其關係，比較以上諸先生的死，尤為重大。我們不幸，當着這個時候，

我們不但有無窮的傷心，我們尤其要有無窮的勇氣！

國民革命，已經開始進行了，這進行是不會中輟的，無論有如何的障礙，如何的牽掣，祇能加以頓挫，決不能令其停止。帝國主義的末路，已在我們的眼前，一切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自從真正革命的團結起來以後，已無復存在之餘地。我們確信國民革命是必會成功的，至於我們個人能及身見其成功與否，簡直不成問題，我們只有堅固我們的信念，充實我們的勇氣，猛向前進。

各位同志，今日在此追悼廖先生，各位同志，將對於國民革命的一個堅決的意念和勇猛實行的志氣，迸發出來，各位同志的精神，與廖先生的精神，融合為一，廖先生肉體雖死，精神不死，兄弟敬大聲的道，「廖先生並沒有死！廖先生並沒有死！」

悼廖仲愷同志勗諸同志

（八月二十二日在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

當國民革命積極進行的時候，三月十二日喪失了唯一的領袖與導師孫先生！不及半年，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悼廖仲愷同志勗諸同志

五四

八月二十日又喪失了最奮鬥最努力的同志廖仲愷先生！我們一般同志恰如一家兄弟，當流離顛沛的時候，喪了慈父，又喪了最親切的兄長，這是何等的悲痛？

當這時候，我們還沒有敘述廖先生生平歷史的餘暇，我們最難過的是廖先生半途遺下的工作，交與何人承繼？他艱難百折，成立了黨軍，成立了種種農工團體，最近掃除叛亂之後，他和幾個同志，共同努力於財政統一，他更單獨的努力於軍事統一，這些工作，都已半途放下，這是他臨死的時候所不能放心然，而他最大的不放心遠的，是他夫人何香凝同志所說，中國國民黨的前途。

人人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所做成的，而不避勞怨，用十二分的努力來實行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廖先生實是第一人。他不但因此廢寢忘食，每日做十七八點鐘的工作，他更因此受一般人的怨恨與詛咒。這種怨恨與詛咒，不是他個人的生死關頭，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關頭，我於悼廖仲愷同志的時候，對於此點，不能不鄭重的說幾句話。

中國今日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故此我們同志現在決不會發生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祇有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問題，就現象來說，中國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條生路。就孫先生的遺囑來說，既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項工作。我們既然要反帝國主義，則帝國主義定然以共產兩字相加，這是三兩年來公然的事實，無可疑的。帝國主義既如此，則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當然隨聲附和，因為反帝國主義是目前所必需的，是要合一般民衆共同努力的，沒有可以非難的餘地。所以只有將共產二字，恐嚇一般資產階級民衆，使之自相携貳，同時和用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在黨內挑撥離間，使之自相分裂，這真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最得意的陰謀毒計，這種陰謀毒計，影響於廖先生個人的生死，更影響於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

我在今日，更無他說，我們同志要反帝國主義的，便向左去，要生存於不平等條約之下，使中國永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國主義之永保勢力於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甚麼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因為，如果要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不是將反共產三字便可作為護符，如果要反抗帝

國主義，祇問他是否實行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更不必問他是否共產。最可笑的，有少數同志，一面勸人反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排斥左派分子，須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因為增加左派分子，所以反帝國主義的工作，纔能活潑有力，這最顯著的事實，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當商團作亂時代，當東江討伐時代，當廣州附近掃除叛亂時代，當沙基慘案發生時代，左派分子，如何努力，如何奮鬥，我們不應盲目，不應喪心，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左派分子？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廖先生，主張容納左派分子？如果說我們要造就一般三民主義的信徒來實行國民革命，這是應該的，但我們決不應該藉共產二字為口實，以排斥左派分子，這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生死關頭所在。

諸同志，中國國民黨繼續發達，以至今日，是孫先生心方所做成的，而廖先生實是孫先生最大的臂助，八月二十日廖先生橫尸於中央黨部門首，使一般同志，明明白白得了一個廖先生為黨而死，為主義而死的最明瞭的印象。廖先生畢命於一瞬息間，沒有半個字的遺言，但我們敢信孫先生的遺言即是廖先生的遺言，我們如果沒忙記中國今日尚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世界上尚有許多窮苦無告的民衆和壓迫的民族，我們祇有向國民革命做法！

革命的分于應有之決心

(九月九日自黨軍在北較場開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說辭)

廖黨代表死了！

廖黨代表爲什麼死的？誰置廖黨代表於死的？

這兩句話，中國人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更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黨軍的同志，尤其不能不問。

廖黨代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他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他這回的死，是爲國民革命而死，置他于死的，是他的敵人帝國主義。試看廖黨代表死後所有帝國主義報紙論調，及兇手的供詞，可以明白。

只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不是外國人，偏偏是中國人，我們拿着兇手陳順，他的供詞說，「廖仲愷是共產，所以打死他。」又說「某港叫我打死他，打死他之後，我可以分得萬多銀子。」噫，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隨便製造一個口號，拿大把的金錢，便可以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好利害的帝國主義的手段！

各位同志，帝國主義不但是殺廖黨代表用這一種手段，便是殺盡中國人，殺盡中國，也是用這一種手段。民國二年間，五國銀行團借二萬萬五千萬給袁世凱，便將革命黨殺的，趕的，趕不能容留在中國以內；民國六年間日本的借三萬萬給段祺瑞，便將西南各處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民國九年以後，英美借幾萬萬給曹錕吳佩孚，便告奮勇，要殺盡中國革命派，川湘各處，次第受其塗毒，而廣東革命政府，更爲其唯一仇殺之目標，以上種種，都是十四年來的事實。各位同志，有從各省來的，有在廣東生長的，不只眼見，而且身受，不用多說。帝國主義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思救中國的中國人，這種手段，已成了習慣。從前的許多中國人，是這樣死法，許多救中國的中國人，是這樣死法，如今廖黨代表，便是這樣死法，將來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救中國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等到救中國的中國人殺盡了，中國也就殺盡了。

帝國主義不用說，他本是國民革命的敵人，最無聊的，是一般中國人，却甘心去做帝國主義

的走狗，替國民革命的敵人，來出死力，陳順不過是走狗中之走狗，這一般走狗，中國隨處都有，我們如果要拿兇手，這一般走狗，沒有一個不是兇手。

中國人殺中國人，中國人殺救中國人的中國人，已經是在情理之外了，然而這一回的案情，還不止此。是以中國國民黨人殺中國國民黨人。兇手是陳順，陳順是朱卓文所指使的，林樹巍胡毅生趙士觀等是與朱卓文同謀的，他們不都是中國國民黨人麼？實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中國國民黨人的責任，而他們却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破壞國民革命，至於謀殺黨裏頭最重要的同志，豈不更是在情理之外？這種原因，無論黨內黨外的人，都不明白，甚至於咨嗟太息，以爲「同志間互相殘殺」我們對於此點，以爲有將原因解釋明白之必要。

凡是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其中必含着許多複雜不純的分子，這是自然的事。中國國民黨，在未改組以前，其中分子，可分爲各派，有革命派，有反革命派，有假革命派，有不革命派，改組以後，仍然如此。只是在未改組以前，因鬆弛散漫的結果，各派繁然雜處，真所謂各不相謀，結合的

力不大，排擠的力量也就不大。改組以後，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驟然緊張嚴整起來，團體既由散而整，在其中分予，自然有由雜而純的趨勢，於是革命的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也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不是革命的團結起來，肅清反革命假革命各派，便是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聯合起來，排斥革命派。這種分化，不但是改組以後所不能免的事，并且正是改組之本來目的。如果一個黨，讓種種分予，糅雜在內，那就只有分予的行動，沒有黨的行動，又何貴乎有黨。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正是就將革命的分予，團結起來，將所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予，驅逐出去。那麼，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予，爲保持他作耗的勢力，自然與革命的分予爲敵。我們無論是當局的或是旁觀的，對此現象，總應該分別個是非，不應該吞嗟太息，說一句「同志間互相殘殺」便作爲了事。

以上所說，不只是黨裏如此，黨所屬的軍隊，也是如此。中國國民黨未改組以前，屬於黨的軍隊，也有種種派別：有公然背叛的，如陳炯明等是，這便是所謂反革命，有假借黨的名義來做盜賊的，如楊希閔劉震寰等是，這便是所謂假革命，至於不革命的呢，一時也說不了許多，總之不肖

犧牲個人私利的，皆屬於此派。在革命旗幟之下，有這種種派別的軍隊，於革命不但無利，而且有害。民國十二年間，廣東一切痛苦不堪的現狀，都原因於此，所以創立黨軍，與黨的改組，在那時候，同有一樣的必要。

黨的改組的結果，如獨自由等，便驅逐去了，創立黨軍的結果，陳炯明等，最先掃除楊希閔劉震寰等，跟着消滅，這便是革命的黨員革命的軍隊團結起來所發生的効力。在這時候，反革命的，與革命的，勢不兩立，固不用說，而假革命的，恐怕揭去面具，現出原形，失了向來的憑藉，其敵視革命的，較反革命的為尤甚。至於不革命的，因為要保持他在黨中的安逸和利便，自然和反革命的做一處，以做他們排斥革命派的勾當。廖黨代表之死，便是死於這一般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黨員與軍隊之手。

各位同志，我們是不是革命的黨員？是不是革命的武裝的黨員？是不是和廖黨代表站在一條戰線上？如其是的，廖黨代表已經做了一個先登陷陣的犧牲者了，我們的戰線，已被敵人搖動了，我們如果不堅持著，有拚力向前，我們的戰線，一定為敵人所沈沒，那麼，不但沒有了我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六二

們，而且沒有了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按住了傷心，提起了勇氣，將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
子，肅清了去。他們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是殺中國國民黨的兇手，是殺中國的兇手，我們要用
嚴厲的手段，將他們掃蕩乾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我們對於敵人仁慈，便是對於同志殘忍。各位同志猛省！
各位革命的同志猛省！

革命的份子，團結起來，不只要存在，而且要擴充，對於一切敵人，應該無容忍無姑息的，使之
消滅，正如古人所謂君子道張，小人道消，欲救中國國民黨，只有此法，欲救中國，只有此法。

我們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外，還應該有一口號，肅清黨內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
命的分子！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我們屢屢和國民說道，民國以來所有的變亂，沒有一次不是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成的。以往事來說，二三年間五國銀行團之於袁世凱，六七年間，日本之於段祺瑞，八九年以來，英美之於曹錕吳佩孚，都是極顯著的事實。以近事來說，在孫先生北上以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國內外，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唆使陳炯明煽亂東江，繼而唆使楊希閔劉震寰跳梁省城；省國民政府對於青島九江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堅持反對，及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引誘廣州一般無聊政客失意軍人，做那狙擊政府重要人物及危害政府的舉動，繼而引誘東江一班殘餘敵人，做那賣國營私殃民自肥的復興運動。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真是越做越露骨，越使國民看得清楚。

只是逃不了一個公例，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只有趁國民未覺悟的時候，可以爲所欲爲，一經國民覺悟之後，他那些勾當，便只有歸於失敗了。試看看啊，今年二三月間，陳炯明等在東江的破敗，六月間楊希閔劉震寰等在廣州的破敗，以及八九月間，廣州內外反革命派的次第破敗，香港帝國主義者眼巴巴望着他的內應，已被革命派摧陷廓清了，由此可

見國民覺悟之後，決不容國民裏頭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存在。

香港帝國主義者，利用反革命派，危害廣州革命根據地的計畫，已經失敗，知到廣州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沒有入寇的餘地，於是變更計畫，對於東江一般殘餘敵人，將些金錢軍械，作為釣餌，使他擾亂東江，這一般殘餘敵人，不用說，自然便上釣了。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計畫，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使這一般殘餘敵人，能夠恢復勢方，和廣州革命政府對抗，永永做他們的看家狗，實行架犬吠堯的勾當。第二個目的，是利用這般走狗的勢力，將汕頭的罷工團體，盡行解散，罷工勢力，盡行破壞，拔去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這兩個目的，現在已經着着進行了。

有覺悟的國民，對於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的計畫，應該怎麼樣呢？

就第一來說，今年二三月間，我們已把東江餘孽掃平了，何以還要回師廣州？是因為楊希閔劉震寰據廣州的緣故。六月間我們已把楊希閔劉震寰的惡勢力掃平了，何以七八九三個月，頗兵廣州，不能將東江餘孽，重新戡定？是因為反革命派的勢力在廣州依然存在的緣故。自從八月二十日廖先生被刺以後，方纔用不妥協不姑息的手段，將廣州及西江五邑反革命

派的勢力，次第掃除，再將東莞增城寶安一帶，反革命派的勢力，也次第掃除，革命根據地，已經打掃乾淨，從此集合革命派的勢力，猛向前進，沒有後顧之憂了。將使東江一般殘餘敵人，不來惹我們，我們也要去剿滅他，以爲人民除害，何況他自來送死。香港帝國主義者供給他們金錢軍械，只算是給他那一般走狗送終便了。革命派的同志，集合起來，掃平東江餘孽在此一舉！

就第二來說，帝國主義者，利用走狗，欺壓人民是他得意的手段，只看他在天津上海，用這種手段，解散罷工團體，破壞罷工勢力，使一般人民，受更深的欺壓，便可見他手段的利害了。他自然的依樣葫蘆的，將這種手段，在汕頭施展，他不知道革命政府和罷工團體一致的，革命政府的勝利，就是罷工團體的勝利，罷工團體的勝利，也就是革命政府的勝利，革命政府既然不容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汕頭苟延殘喘，那麼帝國主義者又何所附逆以爲惡呢。

總而言之，有覺悟的國民，是不會失敗的，因爲國民覺悟帝國主義之爲害於中國，同時也覺悟國民革命之必要，所以日前政府黨部軍隊，省港罷工團體，以及十八農人工人商人，聯合起來，要求和平，要求廣東統一，這便是國民覺悟的一個絕大徵象。

到了今日有覺悟的國民，這種要求，快要實現了，國民爲實行這種要求所必要做的，是以下兩件事。

(一)統一廣東，要分幾個步驟。第一步驟，是鞏固廣州，因爲廣州是廣東全省中心點，必須將廣州統一，纔能將革命派的勢力，集中在一處。第二步驟是肅清東江南路，革命派的勢力，既然集中在一處，便自然能夠發展出來，在這時候，廣州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廣東全省人民了。別的不用說，只說軍事的負擔，有東江南路的人民共同負擔，廣州人民，自然便減輕了許多；東江南路人民，平時本有對於反革命派的軍事負擔，這些負擔是無價值的犧牲，如今換了對於革命派的軍事負擔，是有價值的，何況這種負擔，是與廣州等處人民共同，比從前也就減輕了許多了。這還是就消極方面來說，至於積極方面，廣東全省人民的幸福，也就於此得一基礎了。第三步驟是出兵北伐。民國十三年五六月間，我們曾一次出兵北伐，已經進了江西，節節勝利，却因爲廣東的根據地，沒有鞏固，鞏致發生變故，不得已的回了轉來。功敗垂成，所以出兵北伐，是以廣東鞏固爲前提的。如果廣東統一，現在兵額，至小有五分之四，可以出去北伐，習五

分之一，鎮守廣東，後方無憂，前進便可放心了。在這時候，廣東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全國人民了。關於第二步驟的理論，於此也可完全適用了。總而言之，廣東在這時候，可以說破壞告終，建設開始。以上三個步驟，是要依着次序一一做去，不可躡等，也不可半途而廢的。

(二) 援助香港罷工團體，也分幾個步驟，本來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是打倒帝國主義各種的工作裏頭的一件工作，帝國主義，到了今日雖說末路，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要完全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持久，戰三四年也不定，五六年也不定，在這持久戰中，作戰計畫，爲出奇制勝起見，應當變化無窮。就六月底至九月底來說，因爲省港罷工的緣故，給香港帝國主義者經濟上一大打擊，使他經濟侵略的進行，受一大頓挫，同時因爲切斷香港廣州間交通的緣故，使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失了奔走穿插的作用，使廣州肅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不受牽掣，這幾個月的作戰計畫，我們敢斷言已經得了勝利。從九月底起，我們便已變更了作戰計畫了，我們派外交代表團北上，使他們於經過上海九江漢口的時候，都發起外交代表團，將五月三十日以來，各處慘殺案發生地人民的要求，攏合在一起，更在北京發起各省外交代表團，將全國人民

對於外交的主張，攏合在一起，使國民革命運動的勢力範圍日趨擴大，同時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托是這個外交代表團，做成一個統一的運動，打破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各個擊破的陰謀，這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既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託於外交代表團，同時由省港罷工團體，將復工條件，自動的提了出來，帝國主義者若是答應呢，省港工人團體，便得了確實的進步，若是不答應呢，帝國主義者之忍心害理，益發暴露無餘。在彼為情見勢絀，在我為進退裕如，這也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抱住了一定的目的，同時應用各種適宜的作戰計畫，那最後的勝利，便有把握了。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件事的步驟和方法，便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助革命軍掃平東江餘孽，因為這是統一廣東的關鍵，也是統一中國的初步。同時還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省港罷工團體務要完全達到所提出的復工條件，因為這不僅是省港罷工工人的勝利，是全國人民的勝利，是國民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

廣東人民聽者，帝國主義的勢力多減削一分，國民革命的勢力便多增進一分。有覺悟的國民一齊起來，鞏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擴大國民革命的運動！

十月二日在陸軍軍官學校就開黨代表演

說辭

校長，各位同志，兄弟今日就黨代表職，有幾句話，想對各位同志說。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託兄弟以黨代表的重責，兄弟初時本不敢擔任，因為本校是蔣校長廖黨代表秉承總理的訓令，苦心孤詣，慘澹經營，以有今日，如今廖黨代表中道死去，兄弟自顧才力遠不如廖黨代表，恐怕不能和廖黨代表一樣，担負重責。而且自從七月以來，國民政府成立，兄弟以中央執行委員資格，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日夕無暇，實在不能專心致意，擔任黨代表的職務，從前廖黨代表已深以兼職為苦，何況兄弟更不能不有所顧慮了。記得從前讀過了一首詩，題目是「哲學家的驢子」，敘說一頭驢子，馱着一輛車子，車子上滿載着什物，那驢子一步一步的，

只顧前走，沿途給人在車子上增加什物，他也毫不顧慮，做出一種哲學家的態度，似乎無所不可的。及到後來，載也重了，力也竭了，驢子也倒了，車子也翻了，車子上的什物，都拋落在地上了。這一首詩，對於一般不度德不量力的人，真是晨鐘暮鼓，兄弟所以不能不有所顧慮。

只是仔細一想，四萬萬人裏頭，纔有百餘萬的黨人，這百餘萬黨人，要替四萬萬人擔當責任，那一個不應該像驢子一樣，所以不度德，不量力，擔當過分的責任，不盡是驢子的罪過，只有一面儘管擔當着，一面希望有別的驢子，來分些擔當，庶幾不至於翻了車子。革命黨人，一面強迫自己，一面喚起同志，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兄弟想了幾回，終於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托了。

兄弟本是本校的講師，和各位同志見面的時候很多，有許多話，留着隨時可說，如今所要說的，是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同志間，應該互相討論，互相解析。兄弟今日以此為演說的題目，比較泛泛的說幾句就職的套話，似乎好些。

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很多，如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主軍與客軍的問題，親俄的問題，在平時本已甚為塵土，自從八月二十日慶黨代表死事以後，這些問題，尤其成了焦點，即如

兄弟和蔣校長在特別委員會裏對於時局的處置，也不免惹起社會間的疑問。關於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兄弟八月三十一日在本校廖黨代表追悼會裏，九月六日在本校第二期學生畢業會裏，已經說過，如今不再說了，如今所要說的，是以下的兩個問題。

主軍和客軍，這一類名詞，在廣東是相傳已久，自從八月二十五日，解散了駐省和駐在江門等處的反革命軍隊，九月二十日又解散了駐在東莞增城寶安的反革命軍隊，那些被解散的反革命軍隊，恰恰都是粵軍，而執行解散的任務的，恰恰都是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於是一般造謠的人，紛紛的說道：「這是客軍排斥主軍了，」而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裏，居然也有些自己思疑自己道：「我們客軍不應該犯此嫌疑。」兄弟如今要問的，什麼叫做客軍？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在中華民國的領土裏，我們明明是主人，如何說是客？我們既不是客，又從那裏跑出主人來？所以客軍和主軍的名詞，實在不通。廣東所以有客軍的名詞，是因爲民國三年以來，廣東受了龍濟光所統率的滇軍的蹂躪，跟着又受了陸榮廷所統率的桂軍的蹂躪，使廣東人民，容易養成一種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而民國六年以後，革命黨人裏頭，如陳炯明等，不知

這本着革命的精神，來打倒反革命的勢力，確想利用一般人民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使自己的企圖容易成功，所以九年自漳州回師的時候，便高揚着排斥客軍的口號。果然莫榮新等便在這口號之下被他打倒了，陳炯明等既以排斥客軍自命，當然便以主軍自命。他們以為莫榮新等在廣東並沒有別的罪惡，其罪惡只在一客字，我們既然是主，便一切罪惡都無所謂罪惡了，所以驅除莫榮新等之後，他們自己便不知不覺的成功了驕兵悍將。十年進兵廣西，更充分發揮他們驕兵悍將的罪惡，於是十一年六月以後，所謂主軍，為暴於廣東，更百倍於所謂客軍了。他們的思想，真是奇怪，外省軍隊蹂躪廣東，固然是罪惡，難道廣東軍隊蹂躪廣東便不是罪惡？他們自知在道理上也說不過去，無如在事實上，他們已成了驕兵悍將，回不轉頭，除了蹂躪廣東，再沒有可以施逞他們的獸慾。恰恰在那時候，大軍閥把持中央，藉着統一名目，來擴充地盤，小軍閥割據地方，藉着聯省自治的名目，來保守地盤，他們聽了聯省自治四個字，自然聲入心通的，比着漢高帝要叔孫通制朝儀還要高興了。所以陳炯明等的事業，以排斥客軍始，以聯省自治終，這都是由於他們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他們如不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便只有革命軍隊打

倒反革命軍隊管他什麼主軍客軍呢。陳炯明等既如此，魏邦平更不用說。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革命，他們的的思想，只知道在家鄉發財，做大官，做大地主，此外更無思想，他們以為本省的人祇許本省人做，不許別省人做，本省的地皮祇許本省人割，不許別省人割，所以九年驅逐莫榮新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年援桂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陳炯明是何等罪惡，他們都說道：「孫陳都是廣東人，我們守中立罷！」十二年春間，楊希閔劉震寰假藉驅逐陳炯明的名義，進兵廣東，他們於驅逐陳炯明的時候，袖手旁觀，而於陳炯明被驅逐之後，都掛起排斥客軍的招牌，以致被楊希閔劉震寰打倒。十四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他們仍然說道：「陳炯明是廣東人，我們不必幫手去打。」及至六月間，廣州近郊之戰，他們說道：「這是排斥客軍啊，我們要加入。」他們每於外省軍隊駐在廣東擁有勢力之時，便蹙着眉頭說道：「亡省。」哼，他們不怕亡國不怕滅種，卻怕亡省！他們的是非善惡都以省與非省為斷，所以救國兩個字，是打不動他們的良心，喚不起他們的勇氣的，深刻的說起來，他們所謂省是供給他們做大官做大地主之省，正所謂省其所省，非吾所謂省，所以他們其始不過是不革命，其終必

至於反革命與陳炯明等的假革命，罪惡維均，所不同的，陳炯明等還扭扭捏捏的還，「聯省自治」他們却老老實實的道，「服從中央」便了。以上陳炯明魏邦平兩種人都是在廣東倡主軍客軍的原動者，他們的來源去脈，不過如此，所謂主軍客軍的問題，何值得我們一顧呢？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只知道有所謂革命反革命，不知道有所謂主軍客軍。我們只知道革命團結起來，將反革命的打倒下去，不知這什麼是主什麼是客。二三月間，我們在東江所打倒的，是陳炯明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主軍，我們卻知道這是反革命的軍隊，所以我們要打倒他。六月間我們在廣州近郊所打倒的，是楊希閔劉震寰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客軍，我們却只知道這是反革命軍隊，所以要打倒他。然則我們八月二十五日在省城和江門等處所解散的，九月二十日在東莞增城寶安所解散的，只知道他是反革命的軍隊便了，管他是客軍抑是主軍呢。兄弟記得十三年秋間，先總理在大本營裏，曾召集一次軍事會議，在座的多是湘桂軍官，先總理就座以後，默然無言的約十分鐘，方纔說道：「汝們於十二年春間，替我出力，趕走陳炯明，我是極感激汝們，當時我因為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所以並不想回來，你們卻派人到上海，請我回來，說要服從我

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所以我便回廣東來了，誰知你們卻是戴着我的帽子，來糟蹋我的家鄉，這不要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準備犧牲的，我可勸父老兄弟，都準備犧牲，果然有益於國，將家鄉做犧牲，有什麼要緊？誰知你們卻不是爲國的，我覺得對家鄉不任，尤其對國不任，我決意離開你們。」這是何等血誠，何等慘痛，兄弟和先總理患難相從，二十餘年，聽見先總理痛心疾首的這一番話，一生一世，再不能忘的。兄弟也是一個廣東人，站在家鄉裏，兄弟覺得現在各省同志集於廣東，要將廣東作爲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是不革命的，便喝一口水也對廣東人不任，如果我們是革命的，我們所駛着的車子，廣東人也要分些，不能讓我們獨做驢子。我們現在廣東是如此想，將來出師北伐，經過各省也是如此想，什麼主軍客軍的話，在我們革命軍裏，沒有這一回事。

至於所謂親俄的問題，在香港上海天津一班帝國主義的報紙中，肆意詆毀，自不必說，國內一班帝國主義的走狗，跟着狂吠，更不必采他。最可怪的，一班袖手旁觀的不革命派，也在那裏信口開河的道，「他們何苦去親俄呢？」便連革命黨裏頭，也有些思疑不定的道，「我們何必

要親俄呢？」我們對於這些話頭，只能給他一句斷語道。「忘了國民革命的使命。」須知道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現在何以不得自由平等？因為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此束縛加於中國？是帝國主義。所以帝國主義，是國民革命之最大敵人，所謂軍閥。不過是一些帝國主義之走狗，決不能與帝國主義相提并論。我們既認帝國主義為我們最大敵人，我們便不可不考究帝國主義之來源，及其現在之勢力。我們試將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的歷史，揭開一看，便知道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之敵人，真是世界之敵人。無論將漸滅的紅種，已奴隸的黑種，正在被蹂躪中的棕種，以至印度緬甸安南朝鮮一切黃種，如果覺悟到自己所處黑暗慘淡的地位，是帝國主義所賜，斷沒有不咬牙切齒，認帝國主義為最大之敵人的。我們對於這些共同目標的世界，被壓迫民族，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如今世界，固然是白種人橫行霸道的世界，但白種裏頭，以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其實只不過極少數人，如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等等，其最大多數的，都是窮苦無告的人民。他們在種族關係上，似乎和紅黑棕黃諸種人感覺不同，而在階級關係上他們所受的壓迫，正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無異。

帝國主義一面對於殖民地肆行經濟侵略，一面即以其侵略所得，爲鈴制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資
料，所以世界被壓迫民族，和歐洲被壓迫階級，相互間已因共同利害，誘起共同行動。他們共同
承認帝國主義爲他們共同的敵人，建立了一個共同目標，一致努力打破了種族的界限，成立了
世界革命的最大基礎。我們對於他們打破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工作，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
俄國在大革命以前，也是白種人所建立的國家裏頭，一個極利害帝國主義者，大革命以後，自
己拋棄了從來固有的帝國主義，却被各個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將他封鎖，要他生生的凍死餓
死，他好容易從重重的封鎖中，掙脫出來，自己得了自由，同時也想世界上一切人都得了自由，所
以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便定下了民族解放的策，對於歐洲被壓迫階級，便定下了階級覺悟的
政策，這真真是帝國主義的死對頭，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他的志願，由他的領袖列寧，明
明白白的說了出來，世界上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向二萬五千萬的壓迫人民，
要求解放。我們對於這樣以世界革命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進，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帝國
主義對於中國，從前說瓜分，如今說共管，都是取一致的步驟的，動不動的便英法聯軍，使八國聯

軍，動不動的便三國銀行團，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五國銀行團，他們帝國主義者間，互相聯合，惟恐不力，看見我們和別人聯合，便大嚷起來，好像我們犯了天不降似的。哼，說一句粗魯話，這不和無恥的富人，自己娶了十幾個小老婆，欲怕那些小老婆去備漢子是一樣的用意麼。咳，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勇氣，卻偏要多疑，他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俄國何故幫助我們呢？只怕不懷好意罷。」他雖然不相信理論，他不能不相信事實。比如民國六七年間，日本說幫助段祺瑞參戰，借款和供給軍械，卻一手將中國無數利權，攫了過去。我們根據這些事實，便可以說日本的幫助，是不懷好意，如今俄國的幫助我們就是怎樣呢，他起先和中國成立了中俄協定，將從前帝國時代，對於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特權，一概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惠主權之條約。他隨後認定了中國裏頭那些人是要做國民革命的，便用他的心力，去幫助那些人，他沒有一些別的要求，他沒有一些別的企圖，也沒有沾過一些便宜。他沒有拿過一些利益，他只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也就是他的敵人，他只求以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促進世界革命的 success。我們雖然不相信理論，難道事實是憑空可以捏造的，是憑空可以抹殺麼？

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強固的精神，却偏會有虛驕之氣！他又吶吶的道：「我們革命，要憑自力，不要求人幫助。」須知道在這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在一起，反帝國主義自然也在一起，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互相幫助，算不了什麼稀奇，便是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也是尋常的事。為什麼八國聯軍要舉瓦得西做統帥呢？其他七國，難道便算是放棄主權了麼？為什麼協商國要舉福煦做聯軍總司令呢？別的國家，且不用說，英國有兵四百萬，美國有兵也不下三百餘萬，何以要受福煦的節制調遣呢？好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啊，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求人幫助，並且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以求最後的成功，怪不得叔向說道：「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了。我們如全得俄國同志道義上的幫助，我們便要慚慚愧愧的，怕人間及。喂，同胞啊，你上了帝國主義者老當了，須知道在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線上，我們始終要和世界被壓迫民族在一起，和歐洲被壓迫階級在一起，和世界革命的先進在一起。我們這聯合戰線，是無人可以搖動的，是無人可以離開的，是無人可以衝破的，我們一致努力，一致要求世界革命成功。

以上兩種疑問，已經次第說明，各位同志，總可相信兄弟所說的話，句句是出於血誠。兄弟

的話，本可於此暫歇，只是兄弟還要說幾句話，我們同志最要緊的，是以誠相處，以誠相處之道。第一要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兄弟的說話行事，如有錯的，各位同志必須質直相告，兄弟如不認錯，便不是人，錯而不改，也不是人。兄弟的說話行事，如其不錯，各位同志，便應該和兄弟一致努力，不然，縱使紀律不來責備，自己的良心也要責備自己的。再者我們同志間，要以感情相結，尤其要以理性相契，所以我們同志間，就感情來說，極其親熱，就理論來說，卻極其嚴正。比如最近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特別委員會，拿捕了一些反革命的黨員，和解散了一些反革命的軍隊，有些人便說道：「他們從前都是有功於革命的，何忍出此？」哼，這便是只知有感情，不知有理性的話了，這是封建時代的思想，不是革命時代的思想。封建時代，對於建功立業的人，便要崇德報功，縱使有罪，猶將十世宥之，革命時代，對於有功的人，固然愛之敬之，只是他如有罪，便也不能放過。果因為他有功，便連有罪也不問，那就無異說道：「他從前做過許多革命地事，如今應該由他做許多反革命的事來做報酬罷。」那又何須乎有革命呢？革命是向前進的，不是向後退的，封建時代，所以一治一亂，互為循環，正由於這些觀念，弄不清楚。革命時代，豈容再

有這種思想？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嚴酷，正是對於革命的人仁慈，反之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仁慈，便是對於革命的人嚴酷。假使八月廿五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壓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必因着廖黨代表的死，繼長增高起來，將革命的勢力，推倒無餘，廣州便不能為革命的根據地了，還想出師東江南路，使廣東統一於革命勢力之下麼？又假使九月二十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推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依然存在，縱使我們出師東江南路，回頭一看，廣州已成爲反革命的根據地，至少要像今年二三月間用兵東江一樣，於收復東江之後，仍不能不將東江拋棄，回師廣州了，這不時將同志的血肉，做無代價的犧牲麼？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對於反革命派讓一步，便是使反革命勢力進一步。革命勢力退一步，我就引反革命派出了生路，便是引革命派入了死路，我們有革命的意義極嚴肅的立在前頭，使我們不能不收斂感情歸於理性。有些人說道，「八月二十五日的結果，使胡漢民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九月二十日的結果，使許崇智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他兩個都不是反革命的人，何以如此待遇？」須知道他兩人誠然不是反革命，而許多反革命的正在包圍他，擁戴他，又怎能投鼠忌器呢？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

臬園爲主，譬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封建時代，尙且有此思想，何況革命時代。民國十四年來，所以亂個不已，不是由於敵人之跋扈，却是由於同志間之姑息，姑息二字，最是萬惡的歸宿地，同時又是萬惡的發源地。許多好好的革命同志，就姑息二字，生生的作滅絕。做了反革命，說起來真是痛心不盡。兄弟今日沒有別的要求，所要求的，兄弟若有反革命的行爲，各位同志便立刻將兄弟打倒，因爲我們同志，今日所需要的，是對於反革命派取不姑息的手腕，必要如此，方纔能將國民革命的責任擔當起來。

兄弟的話，已說完了，當東征軍將出發的時候，各位同志，有往前方努力的，有在後方服務的，兄弟敬祝各位同志健康，國民革命軍勝利，國民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自由平等萬歲。

國民政府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天我們在這裏開國民政府特別黨部的成立大會，論起這個特別黨部原來是由大率營來的。不過從本年七月一號起，國民政府才成立，一路又因爲國家多故，直至今天才

有這個黨部的正式成立，有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的選出。單就這點來看，我們對於黨的前途，實在是很有希望，我們想到這個國民政府的來由，大家都知道是由大本營改組而來，當日的大本營，是由我們的總理孫先生親自統率的。現在孫先生雖然不在，但是我們現在在國民政府服務，不論祕書辦事員書記副官衛士，大都是跟孫先生，為國民革命奮鬥多年的同志，其中還有些新的同志，也是因為想竟孫先生生平未竟之志，入國民政府服務的。故此兄弟今天對於座中各位同志，更加有特別感情，我們很是不幸，在半途上失了我們的總理，這在全國的民衆，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在中國國民黨的同志，也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但尤其比較別人加倍的痛惜的，可說是國民政府的同人！本府中的祕書辦事員書記副官，大多數都是和孫總理朝夕親近的，各位衛士都曾為總理出過死力，自從在觀音山悍衛總統府，一直到總理去世，都不會離開過總理的，故此今日凡在這裏服務的同志，於大家悲痛之中，便自然地生出一種互相親愛的感情。如果大家都一致團結，把國家的事情努力，弄個妥當，那末，我們才可以對得住總理。否則我們大家都不爭氣，把總理的遺囑置之腦後，那就總理雖死也不能瞑目了！這一點我們在

黨部的各種聚會，常常生出這個感觸，但在今天却感觸更深，我們試想想大本營爲什麼要改組做國民政府呢？因爲總理已經死了。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實在是當然的，這一層原本不必等到七月一日，已經知道的了。也不必等到三月十二總理逝世之後，就已經知道的了。當十二年冬至十三年初間，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訂黨章時候，我們就老早已經知道，如果一旦總理死後，黨政府和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都不會再有第二位總理的。這在黨章上寫得很爲清楚，大家是可以見得的，黨章上面並不說是『本黨設總理一人』，是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由此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本黨除孫先生之外，是不會有第二個總理的。如果孫先生之外，還有總理，那末，黨章內應該說『本黨設總理一人』，才是爲什麼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呢？』在這一條黨章上面，是明明白白的指出本黨所以有總理的緣故，是因爲孫先生是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導師。目從與中會，而同盟會，而中華革命黨，以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四十年來，都沒有過別一個人做首領的。所以他實是本黨一個天然的歷史的總理，如今孫先生不幸死了，那末在黨便不會

再有總理。在黨政府，便不會再有元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事情，國民政府是受黨的委託的，黨的組織，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的組織，也自然同樣是採用委員制，是毫無疑義的，當着孫先生未死，我們可以一意跟着這個唯一的導師。孫先生既死，我們採用委員制，要使各人都盡其所能，以共同負荷總理所交付的責任，繼續國民革命未竟的工作，這就是國民政府所以成立的原因。

因此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是十分哀痛，一方面却是十分勇敢，所以哀痛的是孫先生既死，從今再沒有這樣偉大的總理做同志的導師，再沒有這樣英明的元首做國民的領袖了！所以勇敢的，是總理既把他四十年未了的巨大工作，交付給同志，同志如果連一點勇氣也沒有，那末黨也可以從此消滅，國民革命也可以從此停止進行了，試問我們各位同志，是否願意看見國民革命的事業，就要跟着總理一同死去？如果不然，便應當振作起我們的勇氣，去擔負各項的工作，這是無可逃的責任啊！

自本年三月十二總理逝世，許多敵人以為中國國民黨也將要同歸於盡，不知總理生前對

於這一看，是老早看見，老早曉得的了。總理在十三年時自己已知道不能夠久在世，這也并不是因爲總理的精神體魄已經支持不來，實在因爲近來年所受軍事上的苦痛，在在足以危險到總理的生命。座中同志許多是前日大本營的文武官吏，大家總見得總理這兩年來，近則受驍兵悍將貪官污吏的掣肘，遠則受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如何的可痛？老實地說，如果當十二年時總理一旦死去，中國國民黨或會一蹶不起也未可料，爲什麼呢？因爲那時新學分子既一些不會加入，舊的分子又日趨於腐化，就軍隊來看，真實忠心於主義，忠心於總理的，都受驍兵悍將的壓迫，一點力量都沒有。那時的軍隊，那些是能夠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的呢？當時正恰有人謠傳總理逝世。如果謠傳果變成實事，那黨的前途，縱然未必就死，恐怕也不是今日樣子了。

總理自從聽過這回謠言之後，所以在百忙之中，也要抽點時間，把他一生創造的三民主義講演出來，又把二十五條建國大綱，親手寫成，好叫後死的同志有所遵依。直到今年春間，他病勢不起，更清清楚楚的在遺囑上把他生前所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宣言，都列舉在這囑上面。其中建國方略，是民十以前做成的，建國大綱，是民國十三年寫成的，三民主義是他一面講演，一面叫同志筆述，再經他自己親自校勘過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則是他親自提出於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這些實在通通是總理的遺囑，並不是從本年三月十二才寫起來的啊。既然有了這幾種重要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的精神却還存在，他到如今仍然可以做我們的指導，我們固然知道現在黨的生命，和黨軍的成立，國民黨之改組，都有極大的關係，但是比較這兩事還更重要的，實是在乎孫總理給我們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這幾件重要的著作既經完成，總理覺得他自己縱然不幸死去，也可以放心了，他的精神，他的主義，他的革命方略，都可以交給同志去繼承。那末，黨就可以不死了。有什麼證據證明黨是不死，當本年三月總理尚在病中，黨軍肅清東江的戰績，已經傳到總理的耳中，這是一事。到本年六月譚組庵朱益之許崇智蔣介石諸同志，又把幾年來所痛心疾首的楊希閔劉震寰一起掃除，這又是一事。這就是剛才所說的一方哀痛，與一方勇敢，如果沒有總理的各種遺教，也沒有同志去接受總理的遺教，這樣孫總理才真是死了，黨也真

是隨着總理一同死了！現在幸而還有這一幫忠誠的同志，願意拿他的勇氣去担負艱巨的工作，拿少數窮困的軍隊，居然肅清東江的陳軍，掃蕩廣州的劉楊，使國民政府能夠成立。實都是一種勇敢的精神！

可是我們一面拚着命去做革命的工作，一面許多人却有點疑懼了。這幾個月來我們拿不妥協的態度，解散了許多軍隊，得罪了許多黨人，因之許多人以為我們是太過鹵莽滅裂，但我們平心靜氣想想，我們究竟是否鹵莽滅裂，我們的不妥協是從勇敢來的，勇敢是從哀痛來的。現在總理已死，我們總不想把總理的遺囑，成爲空文，我們總是想方法去實現遺囑上所交付的工作。那末，我們便不得不努力去奮鬥，求衝破這個惡劣的環境了。就拿十月三日我們把熊克武軍隊處分，這一件事來說，這是我們最近的不妥協的動作，因此便引起許多外面的同志，把我們詈罵，也許在廣州的同志，也一樣的詈罵，亦未可定。但是兄弟請各位同志試想想，前幾天的情形如何，就可以了然了，如果熊克武的軍隊還在北江，我們現在能夠調兵去肅清南路嗎？前幾天南路軍事最緊急的時候，陳銘樞師長僅以三千餘衆，抵過萬的敵人，幾乎給敵人圍困狂

了。國民革命軍的第二師既要衝破廣州，不能調動。除掉第二三軍還有誰可以去援救他。但設使熊克武的部下還在連縣，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夠調動呢？當然熊克武來到廣州時，我們已經查得他一方密電，他的所部由連縣開到含洸，一面由但懋辛駐港和陳炯明相互拉攏。幸而第二三軍能夠趕快把川軍解決，到前幾天，譚祖庵同志所部才可以星夜趕到江門，朱益之同志所部可以星夜趕到鶴山，南路的軍事至此才可以勝利。設使處置川軍略慢一點，恐怕現在的熊克武已經蟠踞着廣州，要說什麼武裝調停，招請陳炯明來省議和了！所以我們的不妥協是勇敢，不是鹵莽，而這種勇敢，却又是從很深的哀痛中生出來的，我們既自承是孫先生的信徒，那末無論什麼困難的事，我們都敢去做的，國民政府所以存在，也全在這一點勇敢的精神了。目下我們一方要和驕兵悍將打仗，一方又要和貪官污吏打仗，和驕兵悍將打仗固然要拚命，但和貪官污吏打仗也一樣要拚命的，你拿他一個貪官污吏，他就有許多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重重包圍着你，不許你動彈，我們如果不是根據哀痛中的勇敢，更如何能夠衝破這種惡劣的環境？

生出新的生命來！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我們幹天下事情，總不外是理性和情感，我們沒情感便不必言仁愛，但我們沒有理性以節制情感，也將變成情面的動物，國事就要敢在我們的手上，總理的遺囑，更無法可以實行了。

今天在這裏開黨部成立大會，離總理的死還不到一年，回想前事，自然是無限哀痛。可是我們大家也要在哀痛之中，生出勇敢，拿起十二分精神把總理遺囑去實現。那末，我們才可以不負總理，現在有些人受了北京政府的蒙養和安福系的指使，竟造謠言說這遺囑是假的，當時孫先生家人和許多同志，都在場看見清清楚楚的簽字作證，假從何來？這本不必多辨，但這些人爲什麼要說總理的遺囑是假的呢？因爲有這遺囑，然後總理雖死而精神還在，就是總理的說話到現在還有效力。那些本黨的敵人，平日想殺害總理，想沒有中國國民黨去做革命的工伴的，到現在他們所希望的已成妄想，就要造出這一條中傷中國國民黨的毒計來，但是敵人雖然用盡他們的詭謀，到底是沒有法子能夠把孫先生的精神弄死的。

座中各位同志，現在一塊辦事，大家都是跟從孫先生多年的。彼此實像兄弟一樣，這個國民政府不是直接做事的，不像省政府和市政府都各有他的直接處理的本務，國民政府純正

作，是在乎通盤的計劃，接受本黨最高的指導。如果大家團結，本着哀痛中的勇敢，恪守着總理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仍然可以常在我們的面前，領導着我們去革命。這就是本黨的元氣，但使這點元氣能夠繼續保持，我們便不枉與大元師共事一場。

今天在此演說，兄弟實在感觸着無限的哀痛，因為我們的總理，已經不在！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有人問道：「革命派裏頭，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不會呢？」這當然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的。

我做這一篇解答以前，先要聲明的，我是專為革命派而說話，至於一般反革命派，滿肚子裏都是反革命，卻偏要戴着反共產的面具，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經營他兩重走狗的生活，我以爲沒有和他說話的必要。

我爲什麼專為革命派而說話呢？因為革命派心地是光明的，頭腦是純潔的，他所窮思力

索的，是其產派與非共產派於理論上有共同立腳點沒有？於實際工作上有共同努力之必要與可能沒有？以為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

如今先取決於理論，我以為這是第一緊要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不用我們來解決，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替我們解決了。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已慮到我們會因為這些問題發生困難，故早已清清楚楚的，給了我們一部民生主義，替我們解決一切困難。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道：「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接着說明社會主義之來源，并對於馬克思學說，與以極詳細之批評。第二講說道：「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如何還可以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衝突呢？有人說道：「看了總理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可知總理的思想，和馬克思不一樣。」殊不知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思想，總應該力求進步，我們對於馬克思學說，如果能學總理的態度，熱心去研究，熱心去批評，這才不枉為總理的信徒，為什麼我們裏頭竟有些人視馬克思學說如仇讎，甚至連馬克思學說也禁止閱看呢？這

不是無理取鬧麼？又有人道：「既然方法有分別，可知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到底不同。」但是爲什麼不將第二講一直看下去呢？總理說道：「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候，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甚麼方法？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但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事實做材，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總理這番說話，真是深切著明。根據着事實來定方法，就和根據着地形和敵人的情勢自己的兵力來定作戰計畫一樣。由此可知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爲事實是活的，不是死的，活的事實要用活的方法來適應他，不能用死的方法，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有些不同，不但是當然，而且也是必要了。如何可說是有衝突呢？而且第二講裏，對於我們已經諄諄告誡，說以爲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的，不但不知共產主義是什麼，而且不知民生主義是什麼，凡是總理的信徒，於此應該平實記着。我關於理論的話，所以如此簡單，因爲我平日主張，對於總理學說，應該細心體認，不應該盪浪解釋，以致犯了戴着色眼鏡的毛病，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說，總不能說民生主義和

共產主義有衝突，如今再說實際工作。

在說實際工作以前，我們應該先問，我們爲什麼要做革命黨人呢？我們可以答道：我們因爲耳朵裏聽不得人民痛苦的聲音，眼睛裏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一腔熱血，沸湧上來，願意將自己的痛苦，換取人民的痛苦，所以我們不怕勞瘁，不怕危險，不怕死，要做革命黨人。

我們應該再問，我們爲什麼要做總理信徒呢？因爲我們既然想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想怎樣的解除人民的痛苦，總理的主義，便是怎樣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最好方法，我們抱着一腔熱血，要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依照總理的主義做去，不然，則此一腔熱血，無所有之，甚至用之不得其所，所以我們要做總理的信徒。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層，我們便應該知道，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一般旁觀的人不同，一般旁觀的人，或者漠然置之，而我們則引爲己之事，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少數批評的人不同，少數批評的人，或者僅以爲有興味研究資料，來做他有興味的批評，而我們則不只要研究他，要批評他，尤其要實現他，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要做實際工作。

我們應該知道，世間一切事實，決沒有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是那時代和環境，有發生這事實之必要，然後這事實才會發生，假如沒有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史，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鴉片戰事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所以總理的主義，是應於時代和環境而發生的，主義發生以後，誠然有促進時代改變環境的效能，而主義之所以發生，不能不說時代和環境實使之然，所以總理之解決民生問題，要以中國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為對象，這是極明白的道理，也是極重要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

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是怎樣的呢？總理於民族主義已講得清楚，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以下，更詳細引申說明，中國因文化衰微經濟落後之故，而至於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又因受帝國主義侵略之故，而文化益以衰微，經濟益以落後，馴至於不能保國，不能保種，所以中國今日除了喚起國民反抗帝國主義，別無其他方法，這便是所謂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國民革命這一件事實，不是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是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要求國民革命之發生，所以國民革命才會發生。在這般的時代和環境裏，中國國民黨負了擔任國民

革命的使命，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裏，也因為看清楚時代和環境的要求，所以來共同担任國民革命的工作。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即使不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在今日所能做的，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這是時代和環境所賦予的使命，無可如何的，落後固不可，躍等也不可，正所謂過猶不及了。

中國現時唯一的要求，只是國民革命，總理的主義，便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根本方略，民族主義如此，民權主義如此，民生主義也是如此。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是研究批評，便可作爲盡職，我們應該想着怎樣的把總理的主義，實行出來，去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使中國人民不至罹國亡滅之禍，使中國的國家，在世界，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僅看做極寶貴的，尤要看做極切實有用的，我們與其談天說地，要怎樣推崇總理的學說，比之於耶穌孔子，我們不如切切實實的，將總理的學說，應用於國民革命的實際工作，因爲這樣纔是真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

以上所說，都是我們現時應該努力的，沒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也如此，有共產派在黨裏

做同事也是如此。他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纔有工夫嘔共產與非共產的閒氣，我們如果做實際工作，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正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和敵人拚命，那有工夫嘔這些閒氣呢？

拿些例來說，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則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或者感想不同，甚至於因此惹起爭執。其實這已是幼稚可笑的見解，須知道馬克思的學說，不但非共產派可以批評，共產派也可以批評；民生主義第一講裏所引的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便是一例，所以單就批評來說，不但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可以纏個不清，便是共產派裏頭也可以纏個不清，我們如果要做實際工作，則必定依總理所說：「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那麼，我們研究對象，是中國目前的事實，對於這一種事實，要應用這一種方法纔可以解決他，這裏頭有一定的道理不可移易的。上頭說過，中國現時的唯一要求，是國民革命，便是因為中國目前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所以即使馬克思復生於今日，也必然承認此方法的不錯。列實是馬克思的信徒，而列實對於中國革命所指導的與總理所指導的差

不多是一樣。由此可見革命的指導者所見略同，這原因完全是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猶如這種病症，使用這種醫藥。一般庸醫，學理不明，認症不清，對於病人的症候，往往七嘴八舌亂說，高手的醫生，決不會如此，斷症用藥，只有小異，決無大差。中國今日所以成爲選稟病夫，便是因爲中了帝國主義的毒，除了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實無第二樣起死回生的良藥，所以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只要實實在在，做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便不愧爲總理的信徒，也不愧爲馬克思的後覺，至於總理和馬克思學說之價值例，思想見解之異同例，留在高等研究科學的講堂裏，慢慢的研究，也并不爲遲。再拿些例來說，國民革命的工作，第一要喚起民衆。這是無可疑的。有人說道：「馬克思的學說，是主張無產階級獨裁，總理的學說，是主張全民革命，截然不同。」這若專就研究和批評來講，自然會造出許多的文章，若在實際工作來講，我們主張全民革命，是否要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呢？中國平均一百人裏頭，有八十至八十五是農民，我們如果忘了農民。則一百人中，忘了八十至八十五，試問這些什麼，連半也說不足，這還單就農民來說，若連工人算上，自然更不止此數。由此可知所

講全民革命，一定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了。有人說道：『主張全民革命，雖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而同時沒有忘了其他階級之利益，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則勢必至以其他階級之利益爲犧牲。』這也是似是而非之論。上頭說過，凡是解決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可見得無論何等學理，都要受時代與環境之支配。例如俄國革命，托爾斯基主張純以工人階級爲基礎。行無間斷的革命，以造成共產。列甯則主張引導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攜手合作，以集中革命的勢力。俄國革命的成功，還是由於列甯主張之實行，這便因爲列甯之主張，能適應俄國的時代與環境。列甯之引導農民階級參加革命，固然爲集中革命的勢力打算，而農民因參加革命之故，於農民階級的利益得了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其參加革命，不爲徒勞。中國今日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不獨農工階級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即知識階級，實業階級亦同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如果知識階級實業階級覺悟到國民革命之必要而積極參加，其結果不但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其本身階級之利益亦必得到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何至爲農工階級之利益的犧牲呢？由此說來，總理的主張全民革命，一方面固然以大多數之農工民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一〇〇

衆利益爲基礎，一方面沒有忘記其他階級之利益。不獨總理的信徒，要熱心實行此主張，即馬克思的信徒，在中國現在的時代和環境裏頭，也必以此主張爲至當。最近胡漢民先生自莫斯科來信，述第三國際東方部的談話，即是主張中國現在國民革命，要求知識階級實業階級的參加，這正是一個顯著的例證。須知道我們爲民衆而革命，同時要求民衆參加革命，使革命之利益歸於民衆。這是必要的理論和方法。所以革命派也好，非革命派也好，如果做實際工作，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還有一義，馬克思派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和總理主張軍政訓政，有名義上雖然不同，在實質上則爲一致，賅括言之，不外以黨治國而已。以黨治國，與開明專制，所以不同，其最大條件有三：（一）以黨治國，是引導民衆的，開明專制，是軍制民衆的；（二）以黨治國，是以民衆爲基礎的，開明專制，是以一人爲基礎的；（三）以黨治國，是代表民衆的利益，開明專制，是代表一人的支配慾。有此三者，所以開明專制，不免人有政舉，人亡政息，而以黨治國，則民衆經一度訓練之後，却能運用政權，以舉全民政治之實。總理在革命運動時代，即制定建國大綱，將革命時期，分爲軍政

訓政憲政三個段落，辛亥之役，此種主張，未能見之實行，遂致決然辭職，民國八年，著建國方略，曾經於此，再三致意。當時總理懷着這種理想，因為未得實地試驗，全國人民，對之還沒有生出信仰，却料不到俄國革命，實行以黨治國之主張，與總理的理理想，如出一轍。所以總理當時非常愉快，屢屢對我們說：俄國革命，一定成功。而俄國革命黨人，讀建國方略，得知總理有此主張，亦不禁條然生敬服之志。總理與俄國革命，精神契合，此亦其一端，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手書建國大綱，將革命進行計畫，全盤披露。軍政時期，掃除革命之障礙。訓政時期，施行政治訓練於民衆。憲政時期，將政權付之民衆。這樣的有條不紊，對於現在之時代與環境，施行對症發藥的救治，同時創造新時代與新環境，一般舊黨員，如果覺悟到辛亥以來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一定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去。一般新黨員，看見俄國革命實收以黨治國的效果，一定也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去。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實際上工作，總是一樣的。

如此說來，我們如果自己承認是革命派。自己認承要做實際工作，那麼我們裏頭，決不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

我也知道，共產派裏頭，也有些不肖份子，總理已經說過：「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常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總理這番說話，何等公正。可知道因共產派裏頭有些不肖分子，而遷怒及之，必更爲總理所不許。

自從總理頌了三民主義的講義之後，凡是革命派，無論爲共產派，爲非共產派，都一致努力，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今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以至最近十月十一月間東江南路之戰，國民革命軍的將士，一堆之戰死的尸骸，沒有共產派與非共產派的分別，已枕藉在一處，所流出來的熱血，已凝結成一塊了，他們可以爲國民革命，同在一處死，我們何不可以爲國民革命同在一處生。說到這裏，我的熱血，直湧上來，我敢毅然決然的說道：我們如果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而妄生共產與非共產的分別，以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者，決非總理的信徒。

今年中秋節之夜，我在黃埔軍官學校裏，有一場演說，其中曾引一段鱸子的故事，如今再引

一段。有一頭驢子，肚子餓了，在青草地上，左望一張草，以為不如右邊的好吃，右望一張草，又以為不如左邊的好吃，如此反反覆覆的，左望了右望，右望了左望，一直的到死了，那青草還沒有到口，唉！總理的信徒，本已不多，有些做不度德不量力，以至於反車的驢子，有些做游移不定，以至於自己餓死自己的驢子，還敢望能繼續總理完了的工作成就總理未完的志願麼？說到這裏，我也不忍再說下去了。

歡迎港僑之演說詞

民國十二年之廣東為最痛苦：橋兵悍將貪官污吏勾結害民……革命事業之新基……掃除驕兵悍將之功夫已做到……軍政財政統一之效果……第二步是肅清土匪製定預算……國民政府先保護產業再開發產業……實行共產是完全謠言……希望人民與政府合作……聯俄之理由與俄人助中國革命之實情……革命不分國界……廣東統一檢宜注重建設……國民革命

是保障全民的利益……農工商休戚相共……農工運動並不壓迫商界

今天諸君惠臨廣州，兄弟受國民政府委員會的委託，敬致歡迎之詞。本來今天的敝會，單說歡迎兩字，還不足以表示我們的誠意的。怎解呢？因為政府是人民的公僕，諸君是民國主人，在政府辦事的人，正如一間商店的夥計，諸君才是商店的股東。現在各位來到廣州，就如股東到他的商店去查數，看看商店裏一班夥計，究竟有沒有偷懶，有沒有侵吞，有沒有做過不可告人之事，有沒有把這一盤生意弄壞。我們做夥計的，看見東家到了，特開這個歡迎會，一方是思報告過去的情形，一方就要求股東諸君的指教，不客氣的指教，所以歡迎兩字，還不足以盡政府委員諸人的意思的。

說起中華民國，實是以人民為基礎的，無論在國境以內或國境以外的中國人民，他們對國家的資格，都是一樣，他們主人的地位都是一樣。我們更知得在辛亥革命以前，海外的同胞，對於民國的關係，比之國內的，實在更為深切。因為在海外的同胞，他的認識，比較在國內的更為清楚。所以民國之成立，實以海外僑胞之力居多。而各位就是僑居國外的，對於中華民國，是

曾經負過很大的責任的，實可說就是中華民國的大股東。諸君此次到省，最先見着的大概就是廣東的人民，現在還有許多痛苦，還未得到安樂的境地，而且諸君自己，自從本年六月念四日以後，商務受很大的打擊，也嘗了不少的痛苦。但諸君最先到省感問罷工工友，便是已經知道他們的痛苦絕不減於各位，甚至深於各位。他們在港時許多是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的，到現在却遇冷沒有適體的衣裳，遇餓沒有適口的飲食，在這種意念之下，我們可以知道，在港的僑商，和離港的僑工，都是受着同一的痛苦，都是爲同一的目的，而受同一的痛苦。這兩日間，各位和各工友互相慰問，互相勉勵，當知大家都是盡國民的天職，爲國家而受痛苦，所以彼此都感有無限的同情。兄弟敢說這不但是廣東前途的光明，也是中華民國前途的光明。

我們做夥計一方見得東家這樣留心店務。當然更應該極力去做，但一方也見得現在的店務，還未妥當，現在的招牌，還未大行，深覺慚愧無地。實在說，這幾年來廣東人民的痛苦太深了，受摧殘也太甚了，這豈特股東應該嘖有煩言，就是做夥計的也有許多難言之痛呢。現在兄弟就趁着這個機會，把有些各位還不能知道的事情，向各位一作極詳細的報告。

我們今天應最先想起的便是民國十二年廣東的情形，實在可以說是入民國以來所未有的痛苦，是自前清以來所未有的痛苦。我們革命黨的志願，原想拿廣東做革命的根據地以改造中國的，眼見着這種情形，其痛苦更加可知。今止引孫中山先生當年的一番話，各位就可以明白。孫先生自十二年春間返粵，到是年冬間，曾召集各將領開過一次軍事會議。那時楊希閔劉震寰都有份列席的，孫先生出席後，足足有十分鐘之久，默坐不能出聲，大家也面面相覷，覺得難過。後來孫先生卒於起立發言了，他說：『滇桂軍各位軍官，你們爲我趕走了陳炯明，是我所很感激的，我當時因爲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原不想回廣東的，我止想在上海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就是了。但是各位都派代表到上海來見我，要求我回到廣東，并聲言要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這是我更加感激你們的。這裏知道我們到廣東，這一來，各人都是戴着我（中山先生自稱）的幌子，來蹭躓我家鄉。』各位想想，孫先生這一番說話，是如何的沉痛？在我們二十年患難相從的黨人，更是感覺如何的沉痛！後來孫先生更繼續着說：『這還不打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是願意犧牲的。如果把廣東躓躓，而於中國有益了，我便約

同家鄉的父老子弟，一齊犧牲，也在所不惜。但是我的家鄉這樣的踴躍，而於國家還是毫無裨益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同在一塊辦事。」當時楊希閔等聽了這般話，臉上一是有些變色了，他們回答的話，是「大元帥今天何必這樣生氣呢，我們都是服從大元帥的，生殺都惟大元帥所命。要我們怎麼樣，我們服從就是了。」隨後孫先生就提出軍權統一財政統一的辦法，他們是席下都一律贊成通過了。可是會議一散之後，他們止是說兩句，「老頭子又發脾氣」就算了。

自此以後，他們連軍事會議也不肯出席，民國十二年以來，廣東人民的痛苦，卒於無法挽救，痛心不痛心呢？在這種現狀之下，難怪人民攻擊我們革命黨的。我們革命黨也自己知道是該攻擊的。他們那些驕兵悍將貪官污吏，互相聯結，日來做害民的勾當，弄到滿地烟賭，滿地盜賊，廣東人民如何不怒？而且那些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在一般人民看來，都是革命黨引他來的，更如何不怒？昨年廣州的商團反對我們，我們也是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反對的，可是他們當時偏找廖行超（滇軍將領）等來做居間調停，却真是顛倒之極。我記得孫先生當時曾有一

次找商團各位到大本營談話，廖行超也都在座。孫先生當時是痛心極了，就很誠懇的對他們說，「廣東的壞，就是這班人不聽我話弄壞的，你們應該和我聯合去抵制他們，爲什麼反要聯絡他們來抵制我呢？」孫先生說這一番話，是明知或者會惹起廖行超等人的反抗的，可是也不顧一切，無畏地說出來了。雖則如此，商團竟漠然無動於心，以致鬧出一場大禍。

但是孫先生在那時候，早已知道這些軍閥是靠不住的，他已經另外的把革命的事業，建好了一個基礎，把中國國民黨改組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造就些真實革命的人材以備將來掃清那些反革命假革命的騎兵悍將，因此才有今年三月的肅清東江，才有今年六月的掃除楊劉，才有八月二十五日的捕拿騎兵悍將，才有九月二十的解散東莞增城的反動軍隊，才有十月三日的消滅做陳炯明內應的熊克武軍隊，才有十月至十一月的再平東江，才有十一月至十二月的肅清南路。目前急應做的事情，願國民革命軍諸軍之忠勇，已算八九做成了，止有雷州瓊州的現尙未下，大約不須一月，也可以完全收復了。可是這樣的連月用兵，實足以加增廣東人民的負擔。各位此次來省，見着許多應做的事還未有做，就是因爲許多錢都已經用之于軍費啊，但

是爲掃除這些驕兵悍將而用兵，也是無法可免之事，試問不先把這等害民的軍隊掃清，各樣應與應革之事，又何從辦到呢？

這等驕兵悍將爲害之烈，也不必說別樣，單拿多數下級兵士的生活來說，就可想而知了。記得他們這些兵士會串一首歌兒，『你說我是兵，我却沒有餉，你說我是賊，我却有官長，你說我是乞兒嗎，我却有枝槍。』由此可知，一般兵士的孤寒痛苦。廣東人現在所負的重担，如果真爲一般兵士的餉項，也還值得，若大批的被這些不法軍官吞蝕，却就令人難忍了。所以我們才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實行財政統一，先把廣東的錢，收歸政府來公平支配。但因此便受驕兵悍將種種的牽掣，不知冒盡了多少危險，造成今日的局面。現在國民革命軍的口號，却是一『不拉夫，不籌餉。』這兩句話，各位但看這回東征，廣州有沒有拉過夫，各軍有沒有自由的籌過餉，就可以相信這個口號，並非徒託空言了。這就是軍政統一財政統一後的效果。我們雖不敢說，現在國民革命軍，已經做到完全能夠保護人民，但各位至少也應見着廣州市內現在已沒有軍隊霸佔民房的事情。計自從七月以後，由政府命令各軍遷出民房的，已有千餘家之多，從

前以爲這件事是萬難辦到的，現在却已辦到了。雖然離廣州市遠些的地方，或尙未免有此等事，但各軍經過政治訓練以後，這個基礎已經打好，將來是一定更有進步的。

第一級騎兵悍將既經肅清，第二級便是肅清土匪。這等土匪，拿着槍就是盜賊，放下槍就是人民，實在是最難消滅的。這個土匪問題，很大很重，自然是非開關實業不能根本救治。但說到開發實業，便非要人民和政府合作不可。孫先生曾有過兩句格言遺給我們，第一句是軍隊與人民合作，第二句是人民與政府合作。但必先行第一步，乃可及第二步，現在可算是已經行到第二步了。照現在的軍額餉項來算，廣東的收入，雖尙未敷支出，但所幸的前時沒有預算，現在都已有了，自從預算委員會組織以後，到現在已經把預算做妥，雖則每月還欠四十七萬，仍然未有着落，但比之從前無數可計的，却勝得多了。此後或將拿五分之四的軍隊，向廣東省外發展，留回五分之一在廣東守衛。廣東人到了此時，担子便減輕得多，保管有安樂的日子了。

目下國民政府固然尙在草創時代，許多事都還未能夠做到的。但同時便有許多失職的軍人，無聊的政客，製造出種種的謠言，兄弟也不敢說座中各位東家，沒有這種疑惑的。甚願就

在今天，向各位說明一下，謠言最厲害的，就是說我們共產，實則吾國今日產業且無，共於何有？如果說句憤懣語，則造謠的軍人政客，才是實行共劃。他們的共劃，是剝地皮之劃，聯合許多驕兵悍將貪官污吏，同心合力去害國害民，這才是共劃呢。現在國民政府，却正要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第一步去驕兵悍將，貪官污吏，第二步去土匪，所爲的無非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將來河道肅清，使土匪不能再有騷擾人民，把各處人民的力量，充實起來，這時便可以做到開發產業，政府現在的計劃，就是先做保護產業，然後才做開發產業的。因爲我們現在想請各位實業家來開發產業，也是說不過意，如許多人半路在舟上給土匪擄去，甚至有時連船也一併被匪搶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實業家回去且不敢，更何從講到開發實業呢？所以我們在政府辦事的人，終日都爲此大事擔心，爲此大事努力，就用自己的血，能博得人民的產業安甯，也都願意做的，各位由此便可信共產是必無之事了。

謠言的第二種便是說我們聯俄。須知道聯俄是事實。我們只要問孫先生爲什麼聯俄呢？是因爲俄國已經取銷了不平等條約。蘇俄自革命以來，便已決定對中國取銷一切不平

等條約，直到民國十三年，便派加拉罕到中國，締結中俄協定，把所有以前俄皇時代與中國所訂不平等條約一概廢除。他既以平等對待我，我爲什麼不和他攜手呢。去年十二月初間，孫先生到天津，已經臥病，張作霖一日約兄弟和他談話，他說『從前我以為孫先生是一個怎樣難商量的人，如今見過他，不知他這樣忠厚，我很同情他幾十年的奮鬥，還沒有成功，故很想替他幫忙，可是各國公使，却沒有一個說孫先生好話的，因為他親俄呀。』他并且誠懇的向我說道：『如果你能夠勸先生和俄國斷了關係，我一定能夠担保各國都和孫先生做好朋友的。』我當時答他，『這事很容易，我們所以和俄國好，因為他取銷了不平等條約，如果各國都取銷了不平等條約，也就是我們的好友了。』他聽了，已覺得不合口味，我知道當時外交團，是正在拿尊重不平等條約，做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因此更對他說明，歷年來我們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怎樣力爭不肯退讓的，就是爲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無論如何是不能放鬆的。可是他至此便已見得說話不接頭，不久且表示絕交的態度了，所謂臨時執政，竟然在十二月十四日就以『外崇國信』四字，答應外交團的要求，把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置之腦後了，這就是今日五卅以

後各地慘案的來由，軍閥之不足與言救國，也就於此完全證實了。

我們須知道國際之間，必先要平等，可以說到親愛。主人之於奴隸，止言恩惠，不言親愛，就是因為彼此本不平等。兄弟朋友夫婦所以能說親愛，就是因為彼此平等。他們列強既不以平等待我，更何有親善之可言。俄國既以平等待我，我又為什麼不可以和他親善，這都是很淺白的道理。

如今更說明為什麼有許多俄國同志來到廣東來幫助我們革命呢？如鮑羅廷先生，我們請他做高等顧問，出席於政治委員會。他在政治委員會裏，真可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苦痛也和我們大家同受，有患難也和我們大家同當，實是很難得的革命同志。反對黨的人，如果見我們措施不妥，儘可直接攻擊我們，為什麼不攻擊有表決權的政治委員，却去攻擊祇有發言權的同志呢？還有一說，俄國的同志究竟為什麼要來幫助我們？現在且引各國以前的革命事實說一說，各位便可以明白。意大利的中興三傑，大家都知道就是馬支尼、嘉富爾和加里波里的。加里波里的是意大利的一個革命黨，他曾經亡命到南美洲，他幫助南美洲的人民革命，並且

任過南美洲革命軍的總指揮。爲什麼呢？因爲說到真正的革命，原是不分國界的。我們中國古語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就是革命黨的精神。（中略）俄國的同志，既在俄國革命成功，所以如今也就來幫助中國革命，正是一樣的道理。不過一個是自己未曾成功而去幫助人，一個却是自己已經成功。而去幫助人，但同樣都是革命黨的本色。俄國同志因爲自己已經成功，更來幫助中國，以求將來世界革命的成功，這有何不可呢？（中略）再拿日本來說，日本的法律改良，都是得力於法人波梳拉度。波梳拉度是法國的一個大學教授，也是一個法律名家，他到日本法律學堂來授課，有一天正在上課，聽得外邊日本官吏審案時候告刑的怪聲，立即聲言日本倘不廢除肉刑，他就不再上學堂的課，後來卒使日本廢除了一切的肉刑。其他海軍則用英人做訓練，陸軍則用德人做訓練，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今俄國同志到來幫助我們沒有享過一些報酬，我們有時多謝他們一句，他們還說他們是爲世界革命，正像我們爲國家革命一樣，不必說甚麼多謝，這是純以革命的目的共同努力，有甚麼可疑之處呢？近來上海的報紙，又來造謠說馮玉祥和鮑羅庭先生訂了什麼密約，但經北京方面一個反證，他們的伎倆便

立即無所施其巧了。我們光明磊落的革命運動，雖然暫時會受人家的譏諷，但終於不做事實的反證的。總而言之，我們與俄國携手，是因為要促成中國的革命，同時要促成世界的革命，這是兄弟敢在今日對各位中華民國的東家說句負責的話，並且請各位東家可以自己細查，知道并不是假話。

以上所講，第一是對於共產謠言的解釋，第二是對於親俄問題的解釋。兄弟也不敢說各位就一定能夠原諒，因為我們自己黨人中還尚有種種說話，不能原諒我們的呢。但無論怎樣，各位究竟要看看我們的事實。現在的廣東，的確是還未太平，這是無法可以向各位告無罪的，不過也要各位知道我們尚是人，我們尚是革命黨，尚是一個肯犧牲自己去為人民犧牲自己去為中國的革命黨，如果各位見得我們有錯，就要加以指發，見得我們有艱難行不通的地方，也就要加以幫助，這就是我們至誠懇的希望了。我們現在的計畫，最大的就是要先把廣東做好，然後再及於全國，講到全國政局，軍閥之打倒是必然的了，昨天兄弟已接到天津的來電，李景林確已失敗，馮玉祥的軍隊，確已入了天津，北洋軍閥，現在實已入了瓦解的形勢了。今後最重要的，

就是（建設）。如果廣東的南路問題，一經解決，我們便要實行軍民合作，先要做到保護人民財產，然後做到開發實業，但求能夠使此一二年內，廣東的民生，漸趨舒展，那就算我們不至白做一場了。

兄弟還有要向各位說明的，就是中國國民黨的農工運動。有些人說我們對農工就說保護農工利益，不理商人，對商人却又說保護商人，不理農工，設使兩方的人都一齊在座，就要無話可講了。但這是不是事實呢？請問現在的罷工工人，我們有沒有對他們說不理商人呢？我們現在對各位講話，又有沒有說不理農工呢？都是沒有的。因為我們現在要幹的，是國民革命的，工作是要求保障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將來國民革命成功，就人人都得了利益，所沒有利益的，祇是甘願犧牲的革命黨人罷了。就實際來說，中國的農工商，實是共同休戚的，即如現在急要實現的是取銷不平等條約，這裏頭最重大的是收回海關，試問收回海關於商人究竟有沒有利益呢？當民國八年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上海商會有一個代表姓榮的到巴黎去，他直說別的事他們商人都未必談，他們單要說的便是海關，因為海關權給外人拿了，外人的貨物，

納稅倒少，自家的貨物，納稅倒多，這如何能夠和人家爭衡呢？而且我們的對外貿易，是隨人家愛抽多少稅就多少，人家運貨到我國，却要受各國協定稅率的限制，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商人簡直是永無發達之望。所以他們也就出盡力量到和會去爭回中國的海關權。如今我們并且找農人工人一齊去爭這個海關權，去謀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明明是大家都有利的，還有什麼可疑之處呢？（中略）工人罷工數月，捱餓抵冷，實在還是有錢的「闊老」來受苦，這豈不是中國人無論何界都休戚相同嗎？在孫先生所著的建國方略，清清楚楚的寫明發展實業的計劃分別各種實業的性質，有些應該由國家經營的就屬之國家，有些應該由私人經營的就屬之私人，國家並且要用穩固的法律來保障私人經營的實業，所以我們主張農工運動，實在並沒有意思去壓迫商家，不過目下農工的地位和生活，却一定要給他們增高，是凡屬人類都應該有的生存權，實是天經地義，斷不能說農工就是生來要做奴隸之理。現在中國的人民，農民足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怎能不幫助他們呢？

總而言之，我們全國人民，不論農工商學兵，能夠一齊合力去取銷不平等條約，便大家都有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之演說詞

好處，政府固有錢辦事，人民也家給人足，農工固然有益，商家更是有益。這條國民革命的大道，爲何不大家一齊走上呢？我們常常說「前人種樹，後人納涼。」孫先生已經用他四十年的學問和經驗，替中國開了一條光明大道，創造了三民主義，定下了建國方針，又建立了與人民合作的軍隊，做國民革命的前驅。我們跟齊了這條光明大道來走，自然就可以得着全中國人民的幸福，這是我們後死的革命黨人，一息尚存，也要拚命去幹的。我們做夥計的有誤會的，已經對各位東家，盡力說明這盤生意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各位從前有誤會的，或者總也明白許多，現在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各位的教誨了。今天所講，都是中華民國前途的問題，我們願大家都各本真誠，在這青天白日之下，作一番推心置腹的商榷。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之演

說詞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君，去年五月十六日，本黨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

廣州議決在八月十五日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並議定組織法選舉法通告海內外各黨部。各地黨部自從接到了這個通告以後，也早經按照組織法選舉法把代表選舉出來。本來在去年八月十五就可以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了，後來因為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發生，各地交通不便，各處黨部許多有函電來請求展期，一展再展，直到今年的元旦，才在這裏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由今天回溯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那一天，到現在已經兩年。照黨章規定，原本是每年開大會一次的，爲什麼弄到兩年才開大會一次呢。這並不是黨務的弛緩，實在因爲時局和環境的關係。當本黨初次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也曾經過過宣言，這是大家都見過的。我們想起今天在這裏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家心上都一定感觸非常的悲痛。因爲第一次大會時，我們還有總理站在我們面前，他告訴我們一切，我們事事都有他的指導，我們只跟着總理向前奮鬥，就斷斷沒有錯了。可是現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不見我們的總理了，總理雖却我們去了。我們現在能見着的，祇有總理的遺像，能聽着的，祇有總理的遺囑。這張遺囑，就是總理最後告訴我們的話，要我們繼續他的精

神去做的了。回憶民國十三年這一年，我們也是在很痛苦很困難的環境中奮鬥的，但是雖然痛苦困難，尙有總理同在，我們仍是很覺愉快的。自從去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去世後，我們遂依着他的遺囑去努力，雖然未嘗沒有一點效果，但因為總理已經不在，我們在奮鬥中，總抱着許多悲痛，所以今天我們曉得座中各位同志，從這第二次代表大會，一定也會想起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總理的說話。各位還記得第一次代表大會中間，恰是接到了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先生逝世的凶耗。總理爲着這件事，覺得非常的哀痛，當時曾停會兩天誌哀，總理並且親自出席演說，說明他哀痛列寧先生的感想。這個時候總理有幾句話，很像是預兆一般的，他說「列寧先生雖死，列寧的黨不死，俄國的革命事業也是不死。我今天在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將本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將來我縱然死了，本黨却還是不死的。」那天總理的說話，今天座中同志，料想許多都是在座親耳聽聞的，當時各同志聽了這番說話以後，心靈上都起了非常的震動。却想不到到了今年，總理的話果然是真的，一點都沒有錯的，他真是死了，他真是離却我們去了。此後本黨的死不死，就祇有看現在沒有死的同志是怎樣了。如果各位同志都是聽

從總理的話的就應當想到究有什麼方法能夠使本黨不死能夠使中華民國也不死。我相信總理雖死，總理的主義不死的，不特是不死而已，而且還是一天一天的往前擴充到全國民衆。總理的主義，就是總理的生命，總理的主義是不死的。我們繼續實行總理的主義，便是繼續總理的生命。故此我們敢說總理實在不死。總理在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如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樣的。兄弟因此更想到去年本黨的同志，因為遵照總理遺下我們的種種教訓，種種政策，固然是已經得了一點進步，但其中有一位同志是幫助總理改組本黨最出力的，又是和蔣介石同志一同接受總理的命令，同心合力去創辦黨軍的廖仲愷先生，不幸也死了。今天他也是和總理一起站在我們面前，要我們同志繼續去奮鬥。廖先生之死，大家明白是因為努力輔助總理改組本黨而死的，是因為努力創造黃埔軍官學校而死的。我們現在要想怎麼樣繼續廖先生的工作，便要知到改組本黨這一件大事。不因為廖先生之死而停頓，便要知到廖先生苦心創造留下我們的黨軍，就是先和人民合作，後來再成爲人民的軍隊，也不因廖先生之死而沒有繼續發展。這些說話，兄弟固然覺得哀痛，但我相信這不是兄弟一個人的哀痛，乃

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人人心中共有的哀痛，不過由兄弟代表大眾說出來就是了。原來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時，應該把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的各種經過情形報告的，關於政治軍事黨務各項，幾日以後，當有更詳細的報告，今天開會，兄弟祇有很簡單的說話，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總理仍然在我們面前指導。」我們還是要繼續總理的生命，要繼續民國十四年我們努力奮鬥的勇氣。我們還是要把民國十五年的樂觀提起來，因為我們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一定成功的。總理已經著出了一條先明大路交給我們，這條大路，是用他四十年的心血和經驗從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來的。他原本要帶領我們同志一齊去走的，但不幸半途死了。我們曾經跟他走上這條光明大路的，就祇有繼續總理的生命仍然向着這唯一的光明大路猛向前進。我相信座中各位同志，都是不願意落後的，都是要猛向前進的，我們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從此以後，團結同志做一體，繼續向這條光明大路前進的。第一步是先求中國革命的成功，第二步是更求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要牢記總理的遺囑，一方面喚起民衆，一方聯合世界上以平等特

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兄弟現在敢高呼總理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歡迎詞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位同志，今天是大會開會的第一天，國民政府委員會同人蒞備盃酒和各位叙會，恭祝各位同志的健康。

兄弟現在受國民政府委員會同人的囑託，敬致歡迎詞於各代表們，我想起民國的成立，到今天已是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元旦之最可紀念者，祇有民國元年的元旦，民國元年的元旦，是先總理就臨時大總統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說是革命政府成立很好的一個紀念，自過了民國元年的元旦以後，由民國二年至民國五年，中間歷受袁世凱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的慘害，沒有什麼可以紀念，由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四年的元旦，又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來壓榨人民，人民受禍，日深一日，也是沒有什麼可以紀念，惟有到民國十五年的元旦，我們在這裏開本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歡迎詞

一三四

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兄弟敢說這個是同志們很可紀念的一個日子，（鼓掌）可是中國國民黨很可紀念的一個日子，（鼓掌）也就是中華民國很可紀念的一個日子，（鼓掌）我相信十五年的元旦，與元年的元旦，有同樣可紀念的價值，（鼓掌）元年元旦，是總理成立革命政府的一個紀念日，十五年元旦是本黨同志繼續承總理遺志去統一全中國的一個紀念日，（鼓掌）我們因此想起自元年至十四年，中華民國沒有做好，究竟原因在什麼地方，也很明白可以看見，我們不能說民元的革命是沒有成就，最少已經革去滿清政府的命，已經革去數千年專制政府的命，已經把中華民國的招牌，高高掛起了，可是中華民國的基礎却實在沒有做好，因為當時對內則民衆運動沒有普遍，對外則打倒帝國主義的目標，還沒有完全決定，所以十四年來，國家不能做好，人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因為對外沒有鮮明的目標，使一般民衆對於反抗帝國主義的觀念，不能發生，更無從致中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這實是中國革命未能成功的一個大原因，所以到民國十三年，總理雖然在十分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也要着手改組本黨，並且決定了兩個策略，第一個策略是喚起民衆，因為農工就是中國大多數的民衆，所以更特別注意於農工

運動，自從十三年至今，民衆運動的思潮，一天高過一天，到現在差不多全國已經知道民衆運動之必要，廣東民衆同爲受總理的直接指導，更有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這個民治的基礎是總理已經親手打好了，在十三年一年中，總理的實力，雖然未出廣州，但這個策略却已影響到全國，自從北上奮鬥以後，全國的民衆，更差不多都舉起頭來了。第二個策略，是對帝國主義，取無畏的精神去抵抗，因爲這一層，致民國十三年帝國主義者加於我們的壓迫，較從前愈加顯露，但因此却製成民國十四年中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高潮，使帝國主義者，都手忙腳亂起來了，這個對外的民族解放的基礎，也是總理已總親手做好了，由這兩層觀察，我們敢決十五年以後，中華民族的進步，與十五年以前一定是不同，（掌鼓）因爲從此以後，中國對內對外的策略，各同志能夠都遵照總理的遺囑去做，是斷沒有不成功之理，（鼓掌）我們就回到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現在這兩年，因爲同志仍然照總理的方針去努力，已經得有一點成績，可見聽從總理的話，是斷沒有錯的，反之不聽從總理的說話，也一定不免陷於錯誤，可是從前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還有總理親身的指導，我們不會有錯誤，現在總理既逝，一班同志，就要求第二次大會切實的

指導了，這次大會最重要的就是要決定民國十五年本黨努力的方案。我們十五年努力的成績，可說就全在這次所定方案之如何，所以國民政府同人對於這回大會實有無限的希望，無限的頌禱，當今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已經明白規定是受黨的指揮監督，實行總理以黨治國的政策，故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會之前，指導國民政府的，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現在既開大會，就全靠此次大會的指導了，國民政府同人，願拿至誠懇至純潔的心事，敬求大會各同志，把本黨工作和國民的關係如何，那一點對，那一點不對，都切實的考量其得失，估定其價值，然後決定種種的方針，國民政府同人是一定不顧一切，實行大會議決的方案，大會所議決的方案，無論如何艱難，如何困苦，一定切實執行，期不負各位的希望，今天開幕時候，我們俗誦總理的遺囑，大家的趨向，是已經決定的，今天參觀閱兵式，大家更可以看見廣東民衆對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熱烈希望，但同時也就可以見得他們還是在一個痛苦的環境，是要我們努力奮鬥去替他們解除的，我們能夠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也就是解除我們同志良心的痛苦了，故此兄弟可以說這民國十五年全國人民的幸福，實全靠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同志的努力，把一條光

明大路指示給他們，兄弟現在謹代表國民政府委員同人再頌各位的健康，請求各位的指教，並請求大家就此各舉一觴。

什麼是反革命

有人問我道：「近來『反革命』三字，與滿州末造『保皇黨』三字成爲一樣惡劣的名詞。」「究竟什麼是反革命？」

我答他道：「凡是不肯反對帝國主義的，和不肯提倡農工運動的，都是反革命。」我這句話，理論的根據，全在總理遺囑。總理遺囑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句，將革命之目的及其方法，說得周密無遺。

什麼是民衆？固然是全民。然而民衆之大多數的，是不是農民，是不是工人？除却農民工人，便是除却大多數民衆，「全」字從何說起？由此可見，所謂「喚起民衆」，有十之七八是

什麼 是 反 革 命

一 二 八

提倡農工運動的意義。

有人說道：「我並不是妄却提倡農工運動，我只是勸資本家對於工人要仁愛，勸地主對於農民要仁愛。」哼！怨我說一句刻薄話。這和封建時代盼望「真命天子」「天王聖明」的思想有什麼分別？何不把大學的「為人君止於仁，改作爲資本家止於仁，爲地主止於仁呢？然則所謂提倡農工運動，是不是只知道農工，忘却了其他民衆呢？我可以明白的答覆道：我並沒有忘却。只是我對於大多數可憐的農民工人，不提倡他求人仁愛，却提倡他能使人不敢以不仁愛待他。換一句話說，便是他有權力來維持道德。

說到這裏，我可以下一句斷語道：凡是看見大多數可憐的農民工人受人壓迫的形景，而不起來助他解除壓迫的，便是不仁愛，便是反革命。

有人說道：「農工運動，我本來是贊成的，只是現在的農工運動，太過幼稚，有許多不良分子夾雜在裏頭，所以我不能贊成。」這些話，只可算是廢話。農工運動裏頭，如何能說沒有不良分子，只要日加努力，組織工夫做得好，宣傳工夫做得好，那些不良分子，自然漸漸淘汰，這有什麼值

得搖頭歎氣的呢？而且人類一切運動中，有誰能說，沒有不良分子夾雜在裏頭，何獨農工爲然。以此藉口，來反對農工運動，我沒有別的話，只說他是反革命！

以上把民衆二字，解釋清楚了。至於帝國主義四字，可以不用詳細解釋，簡括一句話，凡是以上不平等對待我的國家，便是帝國主義。所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一切帝國主義者，如政客、軍人、商家等等，不用說，至於傳教士、教育家，向着我們往往開口便說「博愛」，我們可以問他道：「既不平等，何云博愛？」向來祇是兄弟朋友間，有所謂博愛，因爲他是不等，至於主人之於奴隸，便祇有所謂恩惠，無所謂博愛了。

說到這裏，我又可以下一句斷語道：凡是看見不以平等待我的國家，而猶以爲不必抵抗者，便是不仁愛，便是反革命。

反對帝國主義，與提倡農工運動，雖是兩件事，實是一件事。凡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人，必然與農工運動結合一致。謀農工的解放，卽以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卽以謀農工的解放。反之，凡獻媚於帝國主義的人，必然厭惡農工運動，甚至藉帝國主義的勢力，

什麼是反革命

一三〇

以殘踏農工。他的目的，無非欲將農工有限的脂膏血汗恣意揮霍，以縱他無限的奢侈欲望。所以中國國民，今日祇有兩條路，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

愛倫凱著 朱舜琴譯

戀愛與結婚

此書為瑞典愛倫凱女士所著，有譯本者已多國，其價值即可想見。內中對於『兩性道德的發達』『戀愛的自由，』『自由離婚』『母性之權利』等，無不別其主張卓見，議論正確真摯，闡理精詳徹透；研究現代社會趨勢者，不可不備，研究婚姻問題者，更不可不讀。

全書三百餘頁平裝一厚冊定價銀八角

照碼八折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著 定價四角五分

中山先生思想概要

新覺編 定價二角五分

中山先生文集

定價大洋三角

汪精衛講演集

定價大洋一角

人生哲學

張墨池著 定價二角五分

人格

太戈兒著 定價大洋三角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第一集

一冊

可允

中國革命史

著作

貝華

本書凡五篇：第一篇革命之運動時代；第二篇革命之成功時代；第三篇二次革命；第四篇雲南起義；第五篇護法之役至孫中山逝世。共五十一章，自中山先生創導革命起至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後凡四十年，對於革命諸役均有詳實之紀載，附錄中山先生著『中國之革命』一篇，論述尤為深切。欲知國民黨及中山先生歷史者，不可不手此一冊。

平裝一厚冊 定價五角

中華民國十五年
中華民國十七年

版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講演者 汪 精 衛

編輯兼 發行者 愛 知 社

代售處 上海光明書局
各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573

3/11/38

(27)

